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5月31日第12期 总第25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56期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29）

目 录

【专稿】

章 铎 整理 采访北大离休教授李清昆

【评论】

舒 声 也谈北大文革两派斗争的实质

宫香政 谎言止于真相——答俞小平

【序跋】

啟 之 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序一

刘 明 平民子女的愚忠，求索与苦难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序二

乔晞华 借鉴前覆 展望未来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序

【书讯】

韦 陀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在香港出版

王复兴 编者前言：《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

【述往】

周 平 情系科大：岁月淌不尽的希望（下）

【读者来信】

何 蜀：关于第255期的误植和补充

【本刊声明】

【专 稿】

采访北大离休教授李清昆

章 铎 整理

时间：2019 年 4 月 20 日、25 日、30 日，5 月 11 日

访问者：章铎（北大生物系 63 级学生，以下简称章）

受访者：李清昆（北大哲学系离休教授，以下简称李）

采访方式：电话录音

文字整理：章铎

章：李老师，北大校友樊能廷写的《北大文革简史》您看了吗？

李：我看的是这本书的电子版，因视力不好，只是大体上浏览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拜读。

章：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末尾有一个“夹片”，有些问题与您有关，您看到了吗？

李：看过了。因文字不长，内容又涉及到我自己，读的还是较为仔细的。

章：这篇聂元梓专案人员的回忆，是一个名叫郭大署的人写的，您认识郭大署吗？他是不是哲学系的？

李：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和工作了六十多年，哲学系查无此人。不过从他谈话的内容来看，我敢断定，郭大署是个化名，他的真实名字是哲学系教师陈志尚。

章：能确定吗？您有什么根据？

李：完全可以确定。前几年系里教师聚会时，陈志尚亲自对我说当年他是聂元梓专案组的，审判聂时他曾陪同彭真在法院的另一个房间里观看审判情况。这个根据算是过硬了吧。

章：那您能谈谈陈志尚的情况吗？您同他是什么关系？

李：当然可以。陈志尚（郭大暑）和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是同年级同学，他在一班，我在三班，而且都是调干生。他来自上海，我来自江苏，是一个支部的党员，我长期担任过这个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我是1958年11月提前留校任教的，大约过了一年的样子他也留校任教了，在同一个教研室。我们二人分别结婚后又同住北大23楼，还是斜对门。那时他们夫妻经常吵架闹别扭，我和我爱人（也是同年级同学）还多次登门劝架说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不过到1965年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我们的意见就不同了，甚至是对立的。但彼此之间大面上还过得去。都是老同学、老同事么。

章：郭大暑（陈志尚）在那篇回忆里多处涉及到您，对此您能谈一谈有关的情况和您的看法吗？

李：当然可以。陈志尚（郭大暑）的这篇回忆文，凡是有牵扯到我的内容，说它是“满纸荒唐言”未免有点过分，但里面确实有不少谎言与不实之处。

章：您能说说具体内容吗？

李：可以谈谈。涉及到我的内容，陈志尚（郭大暑）的谎言和不实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陈志尚（郭大暑）说“审判聂元梓时，由李清昆出庭，当庭作证。”这简直就是荒唐到没有边的谎言。审聂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一概不知，何谈“由李清昆出庭，当庭作证”？如果要我出庭，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去吧，那些地方都会戒备森严，我也进不去啊。如果真的要我去，总得有人陪着吧，究竟是什么人陪我去的，你老陈同学能指出来吗？你陪着彭真在另一房间看审判情况，那么你看到了我的身影吗？既然是要我“出庭作证”，叫我当庭发言好了，又何必投影我写的材料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是陈志尚（郭大暑）在编造谎言。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当然更不会“当庭作证”了。

2. 陈志尚（郭大暑）在回忆文中写道：“那时，李清昆来找我，哭哭啼啼，问我怎么

办？”这是他编造的第二个子虚乌有的谎言。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从来都是认真作检讨的，从未像他说的那样，找他哭哭啼啼讨办法。就算真的哭哭啼啼求救，我也只能到校、系领导那里去讲，真的还轮不到他陈志尚的份儿。他这么说，未免自作多情蓄意抬高自己了吧。实话实说，在当时我还真的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因为经过北大社教运动和“国际饭店会议”，我和相当多的教师对陈志尚的人品产生了一定的看法。在社教运动中，当陆平和王庆淑挨整时，陈志尚落井下石，对他们“乱揭发，乱批判，乱上纲”，力争当社教积极分子但未能当上；到“国际饭店会议”时他看到陆平、王庆淑行时了，就来了个180°大转弯，不仅积极批判社教积极分子，还主张给他们扣上“右派分子”的大帽子。对此，就连参加会议的市委大学部干部庞××都感到不妥，劝他“不能把他们比着1957年的右派”，“可是陈很坚持，不肯接受这个意见”。当年，对于陈的人品颇有微词的，在哲学系的教师中确实大有人在。我记得那时岳田老师（后调往天津社科院任副院长）就给陈起了一个颇为形象但又有辱的外号。大家议论陈时，不提名字，只讲外号。因为这个外号有辱人格，在这里我就不应再说了。不过在北大哲学系七十岁以上的教师中，许多人都还记得的。基于以上情况，我怎么会找他哭哭啼啼呢？他纯属在捏造谎言。

讲到“哭哭啼啼”，倒使我想起了一桩陈年往事。1966年6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把整北大社教积极分子的“国际饭店会议”定性为“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当天晚上哲学系就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声讨这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当时，由于大会主持人头脑发热，在大会上一连点了十七个人的名，而每点一人，学生们就把他揪出来示众，这就是哲学系揪出十七个黑帮的由来。在这十七个人中就有我的同级同学陈志尚等。大会结束后，我当即对该主持人提出批评，说他这么做违反政策，但他不接受，我说你这是“形左实右”，他大为恼火一拍桌子说“你是‘形右实右’！”弄得不欢而散。那些日子陈志尚极为紧张，倒是曾哭哭啼啼地找我，承认在“国际饭店会议”期间有严重反革命罪行，请求得到宽大处理。他还讨好吹捧社教积极分子，大意是说你们在那么的压力下能坚决顶住，实在令人敬佩。他还向我透露，会议期间邓拓专门召集他们开会交底，要把社

教积极分子打成“反党小集团”。我见他神情非常紧张，怕出问题，便同他说老老实实把问题交待清楚吧，在哲学系你还排不上号。这也算是向他交个底吧。

这些陈年旧事本不该再提，但对照陈在前面说的那些谎言，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张冠李戴”的成语，在这里改为“陈冠李戴”是不是更为合适。

3. 陈志尚（郭大暑）在回忆文中还说，那时“李清昆天天到颜品忠家跪着，哭鼻子抹眼泪的悔恨求饶”，这也是离奇的胡编乱造。究竟是颜品忠胡编乱造呢，还是陈志尚在添油加醋，或者兼而有之，我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多啰嗦几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派周林任北大党委书记，同来的还有高铁、汪小川、洪影等一批老干部。鉴于哲学系是北大文革的重灾区，周林派了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洪影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洪是一位为人正派、联系群众、政策水平颇高的老同志，据说来北大前曾任内蒙古广播局局长。他来哲学系不久，适逢中央“55号文件”下达，为错划右派改正工作。经系总支其他成员推荐，洪指定赵正义（原系总支副书记）和我具体搞这项工作。洪和我谈话时，我向他提出，因我文革中的问题尚未了结，不适合做这项工作，请另派他人。洪说军宣队（指8341）搞的你的材料我看过了，也做了一些了解，让你和老赵做这件事是因为你们比较了解情况，同时也是对你的信任和考验，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有什么问题可向我汇报。接受这一任务后，我和赵正义专职搞了不到半年，哲学系被错划的近40名右派全部改正，包括学校的顶尖人物市委批准劳教的龙英华和叶于注（叶后留校作反面教员）及已被处决的黄忠奇。当时搞这项工作是很慎重的，所有被改正的都要经过全系教职员大会讨论通过。这些会都是洪影主持，由赵和我分别报告原有结论和改正理由，讨论时如遇卡壳问题，洪便要赵和我作补充说明，遂获得通过。在对待右派改正问题上，洪的思想是相当解放的，近40人全部改正后，他很高兴，对赵和我的工作表示满意，还予以表扬。这期间，我与洪的接触很多，他对我也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东操场第一次批斗聂、孙的大会之前，洪影特地同我谈话打招呼。他对我说，如果

在大会批判发言中有人点你的名，主持人要你站起来时，你就站起来，不要有抵触情绪，千万别说话。后来在两次批斗大会上，均无人点我的名，我自然也就无需站立，但我对洪的关怀和叮嘱是很感激的。

不久，洪又找我谈话，大意是说：你曾分管过三个专案组（指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这三个专案组），现在这些专案组的组长都已分配离校了，你应主动向被专案的受害者登门赔礼道歉，争取他们的谅解，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鉴于当时我对自己的错误已有一定认识，并在系里作过多次检讨，所以认为洪的提示很对，也对他更加感激，便立即按照他的指示去办。在当时凡是能找到的受害者，我都一一登门赔礼道歉，其中有颜品忠、姜鹌鹑（颜品忠夫人）、俞芷倩、韩琴英（何青）、王忠林等。因在清查“五一六”时我和颜品忠都是被清查对象，解除隔离后军宣队又安排我们二人一块劳动，因是本系同事，劳动间歇时彼此谈话较多。当颜告诉我，他被“东方红”专案组×××等人打成“性无能”后，我感到问题确实严重，确曾多次登门向他和姜鹌鹑赔礼道歉，但绝无如陈志尚（郭大署）所写“跪地求饶，哭哭啼啼”之事。我真不知颜、陈编造这些离奇的情节是何用意。

章：除了前面谈的这些，您还有其它想法吗？

李：也还有一些想法，在这里也顺便说说吧。

陈志尚（郭大署）在他的回忆文中说：李清昆“30年不吭气，一吭气儿还是那一套”，“他现在为聂元梓辩护”。但奇怪的是，他说的“还是那一套”究竟是什么内容，又怎么为聂辩护的，却没有下文了。

说我“30年不吭气儿”，这不够确切，我是“40多年未吭气儿”。为什么？因为我在忙于教学、科研和带研究生。文革十年浩劫及前前后后，我已经失去十多年的时间。因此这些年可说是日以继夜，力求多读点书，多做一些事情，以追回失去的时光。这几十年，除了努力教学和指导研究生，还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个人专著、合著、参与主编并撰写教材、辞书等共十余种，多次获省部级及以上的奖项，

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万字以上的长篇近40篇，哪里还有时间去想那些陈年旧事。直到2016年拙著《唯物史观与哲学史——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面世后，才算空闲下来，但这时我已年过85岁了。人生苦短，到了这把年岁了，更感到来日无多，于是产生了在去天国之前写一点过往亲身经历和感受的想法。近两年，我陆续在电子杂志《记忆》上发表了四篇文章：《毛泽东与〈新北大〉》、《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大有来头》、《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论〈矛盾论〉中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关系决定论”倾向》。写这些文字，一是为了说明在北大的长期培养和北大优良传统的影响下，本人多少还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再就是根据亲身经历就我所知，尽可能地给当今和后人研究文革史提供一点历史资料，这也算是一份历史责任吧，别无他求。况且，在这些文字里我还郑重声明：“由于年迈体衰，记忆力不如以前，有些记忆不一定准确甚至有误，有些看法也可能是谬言，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校友们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上述文字写出后，我曾分送哲学系与我联系较多的、文革中分为两派的教师（指“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听取意见。承蒙厚爱，得到了一些好评和鼓励。如一位退休教授给我发了一篇微信，说：“‘背景’一文我拜读了，写得非常好，事实充分，文理清晰，颇有文采。您已是高龄之人，仍有如此澄明之作，令人感佩。我将此文介绍给对文革有研究的一位老师，他读后赞赏不已，感谢李老师留下极其宝贵的一段历史资料。”另有几位退休教授，则打电话给我称赞文章写得好，有价值，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在肯定这些文章的同事中，有原“新北大公社”的，也有原“井冈山兵团”的。

对于我写的上述几篇文章，作为我的老同学、老同事陈志尚（郭大署），如认为哪些内容与事实不符，可以明确指出来，凡是属实的，我必定改正；认为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批评指正，凡是正确的意见，我也会采纳并予以修改。但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我这位老同学不仅没这么做，而是无端地指责我“三十年不吭气儿，一吭气还是那一套”，“为聂元梓辩护。”这类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扣大帽子压人的作为，实在令人费解。我真不知道我那几篇文章究竟触动了陈志尚同学的哪根筋，使他做出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

更为令我惊讶的是，陈志尚（郭大署）在他的回忆文中，不仅编造谎言，而且气急败坏地对我冠以“坏蛋”、“穆仁智”等恶名。这类侮辱人格的作为，对我来说虽毫发无损，倒是充分暴露了他自己品格低下和对文革恶劣文风的继承与延续。你说是吗？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陈志尚（郭大署）和我是同一年晋升为教授的，那是在1991年，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一书可查。时至今日，这位堂堂的北大教授，竟然用郭大署这个化名，以如此恶毒和粗卑不堪的污言秽语来攻击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所为何来，这岂不是可耻、可悲和可笑吗？

有些事情我本应把它忘掉，但陈志尚（郭大署）对我的上述辱骂，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请问陈志尚同学，如果我真的像你所说的是“坏蛋”，为什么前些年你还恳求我给你帮忙呢？

你应该不会忘记吧，前些年你离婚后，北大房产处因已分给了女方住房，按规定要将你的三室住房收回一间另行分配。那时你得知我与房产处处长较熟，便来找我，求我帮你说情。因咱们是老同学、老同事，既然你上门求助，我当即找该处长陈情，说要陈腾房确有困难，况且如果人家又复婚或很快又结婚，还不得再给他分房，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能否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想点变通办法。该处长见我说的不无道理，想了一下便回答说：这样吧，按规定应收回一间，但我们可以不安排新户入住，就算把这间借给陈老师用吧。问题解决后，陈对我说：“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太感谢了。”

我再请问陈志尚同学，如果我真的像你所说的是“坏蛋”，那么为什么在你处于难堪境地时，我还站出来为你解围呢？看笑话不好吗？但我没这么做。有一件事情，知道的人不在少数。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十年前，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任宁芬（原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去世后，学校派了一辆大轿车，送校、系的一些人去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哲学系的老同事参加的有黄楠森、朱德生、谢龙、我和陈志尚等。在返校的路上，不知什么原因，谢龙对陈志尚大加指责。他很激动地站起来指着陈说：“你有什么本事，还不是靠巴结黄楠森拍马屁爬上来的吗？”什么“马屁精”、“小人得志”等词都用上了，而且越说越来

劲，嗓门也越来越大，弄得全车人为之注目。谢斥责陈是靠拍黄楠森（系主任）的马屁爬上来的，使黄很尴尬，陈也非常难堪。当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起身为之解围。我拉着谢龙说：“老谢，你有心脏病，又加了支架，这样暴怒对心脏伤害极大，要保重身体，有话回校可好好说么。”但当时谢龙正在火头上，听不进去，仍在继续不依不饶地斥责陈，表现出怒不可遏的样子。几经劝说，方把他按到了座位上。返校后，当晚黄楠森先生就给我打电话说：“幸亏你出面解围，如继续吵下去，影响实在太坏了，搞得陈志尚也很难看。”事后，我打电话问谢龙：“那天，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谢龙说：“我就看不惯他那巴巴结结、吹吹拍拍的作风。你看，他那天鞍前马后围着老黄转，别人全不放在眼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当年，冯定蒙难之时，他大批冯定是修正主义，但到冯定官复原职（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后，他三番五次往冯家跑，竭尽巴结之能事。冯定知道他的为人，没有搭理他。之后，他又去巴结黄楠森。”谢龙的话，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的为人。

前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几位老人的聚会上，大家不约而同议论起冯定的蒙难过程。曾担任过冯定助手的×××老教授说：“谢龙说的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冯定恢复原职后，陈志尚多次登门巴结他，受到冷遇。冯夫人说：‘陈志尚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可见冯定及其家人，对陈志尚是多么讨厌。”

我还要问陈志尚同学，如果我真的像你所说的是“坏蛋”，那么为什么周培源任校长时还聘我作研究生导师？为什么我们的老系主任、著名哲学家黄楠森先生，还邀我参加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撰写工作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老陈同学今年已达85周岁了。我比他痴长三载，也已近望九之年。到了这把年岁，为了回答陈志尚同学的谎言和攻击，我不得不说这些本不该再提的陈年旧事了，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

我现在仍然坚持原有的态度，希望并欢迎陈志尚同学对我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多做指正，不论在事实方面和观点论述方面，多提实事求是的具体批评意见，而不是用个化名给别人乱扣大帽子，甚至编造谎言，搞人身攻击。否则，就有失身份，太跌份儿了，岂不是弄巧

成拙，自取其辱吗？

章：李老师，我还要问您，陈志尚为什么要用郭大暑这个化名发表回忆文章呢？

李：这你可问错人了。这个问题你应去问陈志尚本人。不过，对于陈志尚同学之所以用个化名发表回忆文章，据我猜想，一是便于他信口开河，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甚至编造谎言，胡写流言。再就是据我了解，他的名声在北大哲学系七十岁以上的许多了解情况的老师中不怎么好，怕用真名说那些话会引起大家的反感和谴责。但愿我的上述猜测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章：李老师，关于郭大暑那两篇回忆，您还想说点什么吗？

李：还有两件事儿，我再啰嗦几句吧。

一件事儿是郭大暑（陈志尚）在他的“回忆”一文中说：“原来是打算逮捕李清昆的，很多群众要求逮捕他。”他的这些话大可怀疑。陈是当时聂元梓专案组的成员，据他说北大参加该专案组的人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样一来，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法查证了。不过，根据我自己在那段时间的经历来看，怎么也与陈所说的上述情况对不上号。一是从周林时期的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兼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洪影这位老干部对我的态度来看，他对我是信任和关心的，看不出郭大暑（陈志尚）说的那种迹象。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许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周林主政北大期间，撤销了清查“五一六”时迟群、谢静宜等人所把持的北大党委强加给我的“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讲到这里，我不能不再多说几句。

清查“五一六”时，军宣队负责人王连龙（8341部队副政委）亲自找我谈话，责令我交待是谁发展我参加“五一六”的，我又发展了谁？并说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现在要看你交待，是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因不知道“五一六”是什么组织，根本无人介绍我参加，更不可能发展别人，当然无法交待。他们清查了很长时间，无果而终。但最后未经党员和支部讨论硬是强加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罪名是：“反康生、反谢富治、反周总理。”对前两条我承认了，但说我反周总理，则断然否认并写了材料加以申

诉，他们不予理睬。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派周林任北大党委书记。我随即对上述处分向党委申诉，要求撤销。我多次找洪影、汪小川（党委副书记，分管落实政策工作）、马石江（党委副书记）面谈，也多次写过申诉材料上报。主要申明我确实反过康生、谢富治，但对周总理是坚决拥护的，《新北大》小报发表的那个关于坚决击退反周总理的妖风的声明，就是我和姜同光（校文革副主任）、卢平（新北大公社总负责人）等人共同商讨后决定的。因那时无复印条件，我把那份声明从小报上剪下来贴在了申诉材料上。经过他们较长时间的了解和研究，提出了一个复查意见，主要内容是：“反康生、反谢富治不是错误；原处分决定说李反周总理没有根据，撤销‘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这个意见的初稿，洪影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后经党委常委讨论通过，作为正式决定在全系教职员党员大会上宣布。这是有据可查的。

郭大暑（陈志尚）说：“很多群众要求逮捕他”（指李清昆）。真是这样吗？其他系的情况我不了解，就哲学系而言，据我所知，无一人有这样的要求，包括颜品忠这样的人，更不用说“很多群众”了。假若说哲学系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我猜想，此人必定是郭大暑（陈志尚）。但我相信，陈志尚当年是不会做出这类事情的。

另一件事是，郭大暑（陈志尚）在《北大文革简史》第890页上说黄元庄、宫香政参加过“红旗飘”专案组，搞过审讯逼供。此说严重不实。黄元庄、宫香政二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据我所知，他们都不是“红旗飘”专案组的成员，更未参加该专案组的刑讯逼供。好在专案组的正副组长×××、×××都健在，只要找他们了解一下，就知道郭大暑（陈志尚）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了。

章铎，你还记得前一段电子杂志《记忆》上刊载的北大退休教授黄兰和李士坤等人有关陈志尚的“微信”吗？我念给你听听：

黄兰：哲学系这个陈xx就不是好东西，我现在见了他都敢当面斥责他。当年他整赵建文、诬蔑赵反周总理。搞逼供信不说，他竟和几个8341军宣队的人（清查“五一六”的专

案组），跑到我劳动锻炼的固安县，让我揭发赵。我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们持续审问我七、八个钟头，也不让吃饭。直到固安县委陪同来的人都火了，他们才说要把我带回北京，去找赵建文放衣服的箱子。箱子存放在赵的姐姐家，他们说里面肯定有反总理的材料。我气坏了，就自己跳上他们的吉普车，说：走！回到北京，直奔那个箱子。我把箱子扔到他们面前，让他们随便翻，结果里面只有几件我的破衣服，连个纸条都没有。后来在不同场合（北大校园或食堂），赵建文和我都当众骂过他。他要是还造谣整人，一点也不奇怪。

李士坤：黄兰，陈 xx 这个人我是知道的，是一位不甘寂寞又尽做坏事傻事蠢事之人。关于文革和北大之事我意不能与此人交流，交流也无益，他是说不出什么真实情况的。我还依稀记得工军宣队在哲学系开党员会议，要开除老赵的党籍。在这个会上，此人站起来发言表示赞成、拥护。当时明确反对的有两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对立派的郭罗基。

章：想起来了，我当时看了那期《记忆》后，心中还想：怎么把几个人在微信上聊天的内容也公布出来了呢？李老师，您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能否将您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出来，给历史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呢？

李：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我已年近九旬，体力和精力都差多了。我将尽我所能，把我知道的事情写下来，这也是我最后的责任了。你和你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如实回答你们，绝不保留。

章：谢谢李老师。您多多保重。

【评论】

也谈北大文革两派斗争的实质

舒 声

《记忆》249 期刊登的北大校友王复兴的文章“从北大文革看继续革命论”，比他以前写的文章有所进步，承认了一些事实：“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以镇压为能，校文革竟然

于 1968 年 5 月，在两派武装割据，武斗气氛浓厚的形势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校文革成立了三个“专案组”，清查“红旗飘”、“东方红”、“北京公社”三个小集团里的坏人。在专案组的审讯中发生了逼供信问题。樊立勤同学被打伤，打残，就发生于此阶段。这是违反人权的迫害行为！”“武斗期间，北大死了三个无辜的生命，这更是聂元梓和校文革不能逃避的责任！”（此文把樊立勤被打伤致残的时间搞错了，樊立勤是 1968 年 3 月 27 日被新北大公社抓走的，在关押审讯期间，用竹签扎手指，用铁钉钉膝盖，用烟头烫肚皮，残害得奄奄一息，于 3 月 29 日扔出，被井冈山的同学送往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成为残疾人。）这比聂元梓本人在回忆录中回避责任，说“在北大武斗中，没有打死人。地质地理系学生刘伟（应为刘玮），不是在武斗中被打死的，而是在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聂元梓回忆录，271 页，时代国际 有限出版公司，2005 年）要强的多了。但是王复兴文章里仍然有许多不实之处，特别是打着批判“继续革命论”的旗号，对北大文革两派各打五十大板，说北大文革两派斗争的实质是争权夺利，更是不符合北大文革的历史事实的。

北大井冈山师生为何要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

众所周知，北大是文革的发难地之一，1966 年 6 月 1 日晚，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当晚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就派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7 月 25-26 日，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在北大召开万人大会，号召“搬掉工作组这个障碍物”，点名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成为校文革主任后，一面亲自带队去上海揪斗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带头写出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在校刊上攻击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面在校内成立劳改队，关押部分干部、教师，以反击“十二月黑风”为名，批斗“井冈山”、“红联军”成员，抓捕杨勋、杨炳章、乔兼武等人，并打击排挤校文革内部的不同意见者孔繁、杨克明等。在校文革的指示和支持下，一些系也对部分师生进行了打击批斗，如中文系总支书

记程贤策自杀身亡，陈一諮遭到残酷批斗殴打，整了沈达力和“222 反革命小集团”等学生，造成沈达力的自杀。1967年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还有很多群众也纷纷贴出大字报或组织串联会，要求聂元梓和校文革整风。北大绝大多数群众本来是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但聂元梓面对群众的意见，不仅不虚心接受，反而文过饰非，排斥打击给她提意见的人，使得广大群众极其失望，陆续成立了《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红旗飘战斗队》、《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7月1日，周培源等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的一切革命行动”。上述五个组织与8月17日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并被接受进入首都大专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井冈山兵团里，有部分师生是挨过校文革、系文革或年级、班级整的，他们对聂元梓和校文革有怨气，是很自然的，而大部分师生虽然自己没有挨过整，但是同情被整的师生，对聂元梓、校文革有意见，但不被接受，他们参加井冈山，反对聂元梓的专制行为，只是一种表达自己争取民主意愿的诉求，并非想夺权、掌权，也知道自己夺不了权，把他们说成是什么“继续革命”，未免上纲上线太高了，他们还真的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北大武斗是谁挑起的？

王复兴文章中说：3月29日（1968年）“井冈山”武斗队攻占了40楼、32楼，赶走了居住在这两个楼的“公社”同学。以上一系列武斗事件，起码说明北大武斗是两派共同挑起，由小到大，愈演愈烈。

王文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北大武斗，已经有很多亲历者写了文章，作者包括原井冈山的，也包括原公社的和当时在北大的校外人员，例如原公社成员司徒文、田建行，校外人员理胜（北大元老沈尹默先生的后人），一致见证北大武斗是3月29日凌晨，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驱赶 31 楼井冈山学生而引起的。2018 年 8 月，由北大校友张从、樊能廷、俞小平主编的《北大文革武斗纪事》一书，刊登了 32 篇文章，全面记述了北大武斗的情况，从各方面证实了北大武斗是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由校文革领导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挑起的。王复兴如果愿意看，笔者可以赠送一本，以便他参考。王复兴所说的 40 楼，3 月 29 日确实发生过两派的冲突，井冈山抓住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几个人，后来释放，但该楼从来未被井冈山攻占，而一直在新北大公社的占领下；而 32 楼，则是在 3.29 武斗后被井冈山占领的，当时公社人员早已撤出，并未发生武斗。在当时的情况下，校文革是掌权派，掌握北大的财务、物资、后勤等控制权，在武斗爆发前，早已成立了专业的武斗组织，发给棉衣、柳条帽、长矛等装备，并进行了训练，还设立了医疗站，做了充分准备，所以 3 月 29 日顺利地驱赶了 31 楼井冈山的学生，3 月 29 日后又对井冈山的几座楼进行了围困。而井冈山是无权无势的群众组织，没有任何的资源，完全处于劣势，要挑起武斗不是自寻死路吗？只是在 3 月 29 日后，井冈山才慌忙地占领了几座楼，构筑了一些工事，在武斗中完全处于守势，能够生存下来已是万幸了。所以王复兴说武斗是两派共同挑起的，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符合逻辑的，表面上似乎公允，其实是为真正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进行掩盖。


北大两派斗争的实质

王复兴文章中说“两派斗争的实质是争权夺利。为着后文革的利益，展开激烈的夺权和保权的内斗。”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那么，文革中北大两派斗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要从当时两派所处的地位，相互关系和各自的诉求来进行分析。首先，北大当时矛盾的双方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为一方，以井冈山为代表的部分师生为一方，前者是掌权派，后者是无权的普通群众，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支持下的群众组织，和反对校文革的井冈山是平等的关系，只是观点的不同。其次，校文革成立后对部分干部师生实行专制统治，用各种方式整人（包

括关牛棚、劳改、抄家、批斗会、打成反动学生、现行反革命，抓捕关押、逼供信、整黑材料等），激起了部分群众的反对，很多人的立场发生变化，从支持校文革到反对校文革。井冈山成立后遭到校文革的压迫，发生武斗后更被围困几座楼里，被断水、断电、断粮，校文革还派出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抓捕井冈山的骨干分子和支持井冈山的干部教师。为了求生存，井冈山兵团不得不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所以北大两派斗争的实质是专制与反专制、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而不是什么争权夺利。聂元梓当时是被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领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大校文革主任，炙手可热，权势冲天，井冈山的师生不可能去夺她的权，只是反对她的行为，想争取一点起码的权益（用现在的说法是人权）。井冈山的头头中有些曾是校文革的副主任、常委和委员，本来就有一定的权利，只是看不惯聂元梓的作风，反对她的倒行逆施，才与她分道扬镳的，可见他们对权利并不看重。而只有聂元梓、孙蓬一等人整天念着权经，念念不忘手里的“红色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势打击迫害反对自己的干部群众。

近年来争论是怎样引起的？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校文革的权力被宣传队和革委会取代。1969年3月，8341部队进校后，经过大量调查，给校文革做的结论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也被北大广大群众认可。粉碎四人帮后，聂元梓、孙蓬一受到了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北大老五届学生毕业后，经过相同的苦难经历，对文革也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自从2005年聂元梓出版了回忆录后，围绕着北大文革，原北大两派的校友，又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争论。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极力为自己洗脱，更不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关威的“英雄”。原井冈山的北大校友当然不能同意她的观点，陆续写出一些文章进行反驳。而在文革中曾经和她关系密切的几个公社成员，却极力为她辩护，也写了一些文章并出书，把聂元梓说成是反对文革的，为她表功，甚至把她和朱成昭相提并论，这就

大大歪曲了历史事实。王复兴的文章把北大两派斗争的实质说成是争权夺利，表面上对两派各打五十大板，实质上是不分是非，混淆黑白，掩盖聂元梓和校文革在文革中的严重罪行。所以说，近年来的争论是由聂元梓出书而引起的。争论既然被引起了，就不可能轻易停止。站在今天的价值观上，对北大文革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反思，重新认识北大文革两派斗争的实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愿以此话题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文革研究者发表看法。

【评论】

谎言止于真相

——答俞小平

宫香政

前言

《记忆》246期发表了俞小平的文章《事实与逻辑之二》（以下简称俞文），主要是针对我在《记忆》234期发表的《论政治倾向性》一文，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俞文歪曲我文章的原意，并给我开列了十大罪状。看后我感到，这种狭隘的、派性意识如此强烈的文章，不值得我答复。不料《记忆》251期又发表了俞小平的“读者来信”，说什么“宫香政甚至对我给他列出的在北大武斗中所犯罪行这样严重的指责都没有回应，让我觉得我的论战如同打在棉花上。如此一来，北大两派在《记忆》上的论战实在是在浪费时间，达不到揭示真相的目的。”

“谎言止于真相”，我是否犯下了俞小平所说的十大罪状，是否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请看如下事实：我进新北大公社总部八个月，前期搞宣传。1968年3月22日进“文攻武卫指挥部”，我只参与了“3.28—3.29”北大武斗的策划，是一线指挥员之一。“3.28—3.29”武斗使两派同学受到伤害，这是我唯一的错误。我没有上台批斗过“陆平黑帮”，没有掀

斗过老师，没有伤害过同学，更没有策划、指使、授意他人抓捕井冈山的同学。武斗期间，公社一方发生打死人的事件，是由于个别人的冲动造成的，与我无关。“身正不怕影子斜”。面对你宣布的十大罪状。我要说的是：你没有资格，更没有权力这样做！

北京大学是文革的重灾区。北大的师生员工，无论是哪派的，都深受其害。作为北大文革的亲历者，给后人和历史留下我们当年亲历的事实真相（不是评论是非），是我们最后的责任。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件事情，可能会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有些重大事件的内幕（例如“陈伯达六五讲话”和“3.25万人来北大”的背景等），我们很难或不可能搞清楚。但只要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努力去伪存真，真相就会越辩越明。

北大“反聂派”的兴起，是“由于聂元梓的专横跋扈不能容人”吗？

毛泽东打倒了陆平，中央文革赶走了张承先工作组，北大全校师生在钦赐的“新北大”的大旗下都成了“造反派”，没有来得及从组织上分成“造反派”、“保皇派”——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先天不足”。

1966年10月6日，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路远、周闯贴出题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打响了北大两条路线斗争辩论的头一炮。随后成立的“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简称“井”）和“红色造反联军”（简称“红”），其斗争矛头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反对派指责聂元梓“对大串联不积极”、“批陆平太‘温’”、“不让成立红五类子弟协会”、“聂元梓说‘工作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右倾”，等等。所有这些，只能说明反对派更“左”（聂元梓紧跟毛泽东，已经够“左”的了）。

1966年11月12日，“井、红”砸了校刊编辑部后，中央文革把砸《新北大》校刊编辑部定为反革命事件。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1967年1月3日和1月16日两次接见聂元梓等人，江青说：“你们学校刘邓路线具体表现在孔繁、杨克明身上”；“孔繁到

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工作中，又将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人的言行也归为“现行反革命”予以打击。

根据上级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和当时有关领导人的具体指令，校文革派人向公安机关扭送了魏秀芬、杨炳章、杨勋等人；部分系的师生对孔繁、杨克明和“井”“红”中的一些人进行了批判。第一次的“反聂”浪潮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以“井”“红”被摧垮而结束。现在看，这些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陈伯达的“六五讲话”，引发了北大大乱。1967年7月1日，周培源、郭景海等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其中写道：“我们认为，从三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1967年3~6月，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归结起来，无非是三件大事：对“二月逆流”没有反击，而仅仅“炮轰”、炮打谢富治、向关锋在基层的势力吴传启们开战（吴传启是关锋的密友）。

受周总理指示，北大参与一月夺权，在高教部和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等组织发生严重冲突。王力、关锋出来拉偏架，对北大进行了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批评。北大从所有的夺权点撤出，回校开始整风。聂元梓、孙蓬一等核心人物，认为学部的吴传启和高教部的卢正义等联合起来搞北大。而有一部分人认为王力、关锋的批评有道理，要批判聂元梓的私心杂念。

3月7日由学部联队（吴传启为首）和师大井冈山（谭厚兰）等6个组织发起的反击“二月逆流”浪潮，要打倒几个副总理，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北大在这场浪潮中，没有盲目跟风，成为“炮轰派”的一员，还被某些人封为“二月逆流派”。

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到钓鱼台，向江青、陈伯达告状，说王力、关锋

“结党营私，招降纳叛”。这就是后来扣在聂元梓头上“分裂中央文革”的具体含义。

4月11日下午，地质学院“东方红”带领五个院校，开了六辆广播车，以“民族宫事件”为由，来北大兴师问罪，但其口号却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聂元梓无权进入北京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北大校文革压制真正的造反派”等。

4月12日晚上，孙蓬一在大饭厅发表演讲，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并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力、关锋。

4月13日，谢富治主持会议处理“四一一事件”时偏袒一方，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鲁莽的孙蓬一在当晚群众集会上发泄了对谢富治的不满，引发群众炮打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前夕，孙蓬一的这一举动后果非常严重，不但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也给了反对派一个很好的口实。

4月16日，地质学院革委会和东方红公社发表《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声明》。声明说：“孙蓬一的两篇讲话，恶毒地挑拨中央文革内部的关系，否定革命小将，扶植保守派，打击革命派，拼命为刘邓反动路线歌功颂德，炮打谢副总理。这是两篇浸透了毒液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公开消毒”。“孙蓬一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揪出来由全市广大革命造反派揭发、批判、斗争。”

从4月下旬开始，北大向吴传启们发动进攻，这危及到中央文革的安全。从5月27日起，中央文革的大员多次打压聂元梓。

6月5日，在傅崇碧主持召开的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上（谢富治参加），陈伯达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呀？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伯达的“六五讲话”使北大出现了大动乱、大分裂的局面。

俞文写道：“从1967年春，由于聂元梓的专横跋扈不能容人，反聂派在北大再次兴起。”

俞文没有具体解释“专横跋扈不能容人”，当然没有讲“三件大事”，更没有提及北大分裂的直接导火索——陈伯达的“六五讲话”（目前某些人极力回避之）。这与奚学瑶校友和周培源先生的坦率相差甚远。

奚学瑶在《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一文中写道：六月五日，陈伯达“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北大是死水一潭’。于是，蕴积在人们心底的火山，‘唵啦啦’一下猛然喷发了，‘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纷纷亮明了反聂的旗帜，新北大公社内部也冒出了一个‘革命造反总部’，公开与聂元梓切割。……北大顿时天下大乱，‘大一统’的局面被完全打破了！”

周培源先生 1967 年 6 月 16 日晚在新北大北京公社、红旗飘、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举行的“彻底批判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六月五日晚上，陈伯达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在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的问题。伯达同志的这个严肃批评，特别是对我校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现实意义。他的这个重要讲话，使我校的文化大革命有可能扭转错误的方向，指点我们朝着正确的航向。

探讨历史真相，不能光听俞文现在怎么说，更要看井冈山兵团当时怎么做。

1967 年 8 月 17 日，反聂的团、O、飘、井、红五大组织联合组成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在其成立宣言中写有如下文字：“他们把新北大公社作为他们执行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他们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动摇北京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他们在校内外，扶植保守派，打击围攻革命造反派，挑起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等。

1967 年 8 月 30 日出版的《新北大报》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写道：

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千方百计地动摇无产阶级专政，颠覆北京市年轻的红色政权，充当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的代表！时至今日，他

们仍盘踞在北大的各个要害部门，还在固守资产阶级阵地，准备“十年八年受孤立”，负隅顽抗。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非彻底砸烂不可！这样的权非夺不可！

我们在北大进行的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就是代表全市和全国革命造反派向保守势力夺权！就是为工农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权！就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向资产阶级代理人夺权！我们的夺权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

必须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专政！必须摧垮臭名昭著的新北大公社！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在路线和政权问题上决没有调和的余地！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将“倒聂运动”进行到底！必须将一切权力全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由此可见，北大反聂派的兴起，绝不是“由于聂元梓的专横跋扈不能容人”。

近几年来，已有多位校友撰文说明北大两派分歧的实质，近日古樟著《“四月形势图”——北大及北京市两大派分歧的实质》（《记忆》249期）再次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谁在为王关戚摇旗呐喊？

对王、关、戚的态度是北大两派分歧的关键点之一。这几年两派在《记忆》上发声，一些校友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有些人不但视而不见，而且编造各种理由为自己粉饰。

俞文说：“当反聂派尚未联合成为井冈山兵团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诸公就开始以反聂派支持王力、关锋、戚本禹为罪名，攻击反聂派和后来的井冈山兵团。”如果真像俞文所说的那样，新北大公社早就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而垮台了。俞文还说：

井冈山的报纸为王关戚摇旗呐喊，正像当初大家支持“伟大领袖”的文革运动一样，正像新北大公社也为王关戚摇旗呐喊一样（不要说你们没有这样做，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上连篇累牍登了很多篇，你要是想知道，你可以到北大图书馆去读，我也可以给你发

一个目录），正像我们两派都为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陈伯达，以及文革干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摇旗呐喊一样。没有一个群众组织能理解文革的本质而不这样做，也没有一个群众组织能不这样做而生存下去。官香政同学找不到任何井冈山负责人与王、关、戚的直接关系的证据，因而拉出洪涛、刘郅等，等而下之的北京某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当替罪羊，不觉得过于可笑吗？

上述两段自相矛盾的话，说明作者或对北大 1967 年的历史不知其详。确实，《新北大》上有拥护王力、关锋的东西。问题是，当时《新北大》能刊登反王关戚的东西吗？1967 年 4 月 14 日出现一张大字报：《吴子勇四月形势图》，点了关锋的名字，并用××代表康生。当时只有这一张大字报点了关锋的名。陈伯达“六五讲话”后，某些人就以此大做文章。如果新北大公社多几件点王力、关锋的名的事，反聂派岂能放过？真得感谢聂元梓制定的方针：“只打叛徒不上揪”。不要说王力、关锋的大字报不能写，连林杰的大字报也不能写。孙蓬一说了一句“林杰的老婆”，就被反对派抓住。7 月 10 日晨陈伯达来北大，在大饭厅与群众交谈时，有好事者告状：“孙蓬一对林杰同志不尊重，管林杰夫人叫老婆。”陈伯达回答说：“老婆吗，大众化的语言。”这样的笑谈，曾在北大流行。当时一份大字报《牛山丑史》就记录了这段笑谈，俞同学是否记得？

王力、关锋 8 月底倒台了，井冈山兵团是如何认识的呢？它能承认保过王力、关锋吗？公开场合肯定不会，还要给自己找一块遮羞布。1967 年 10 月 23 日出版的《新北大报》（第 17 号）第一版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彻底改组校文革 实行革命大联合》写道：“现存的北大校文革，曾和特务王任重打得火热，为谭震林二月逆流推波助澜，疯狂炮打谢副总理，放肆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放肆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指责新北大公社反对王力、关锋——毛主席没有叫你们反王力、关锋，你们却反了，就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俞文说：“王关戚的失势，不过是文革派内部分裂的结果。”意思是毛泽东自己端出的王关戚，和你们没有关系。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你认为，王关戚在文革中的罪行和责任，比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以及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的罪行和责任更大？”

请看事实：1967年底，井冈山兵团散发了一份题为《聂氏家族的复灭和聂元梓的前途》的传单。传单中有这么一段话：为什么聂元梓不管中央首长的三令五申，这样不惜工本，大张旗鼓地“讨伐”关王呢？经过一番探讨之后，人们便会发现这是一个诡计，这是一个阴谋，这是由另外一个由反党阴谋家、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间谍、苏修特务、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组成的乌七八糟的社会阴谋集团所精心策划的大骗局。

王力、关锋在位的时候，批判他们是“分裂中央文革”。王力、关锋倒台了，批判他们则是“社会阴谋集团所精心策划的大骗局”。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发动武斗是为了自保吗？

俞文提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一个没有后台的组织，无权无钱无势，只有一帮穷哥们儿，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等等。除了跟着“伟大领袖”糊里糊涂地为文革摇旗呐喊，就是在校内外抵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进攻，力争保全性命，不要落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对井冈山兵团的定性）。

请看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兵团成立时《新北大报》报导：“来自首都及全国各地的二百六十多个单位的上万名革命造反派战友满怀战斗豪情，胜利的喜悦，汇聚一堂。一句话：井冈山兵团的哥们遍天下！”

再来看看上面的“势”吧：1968年春天，聂元梓发动了一次“反谢”浪潮，原因是以

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的某些人反对批判王、关、戚。随即，中央就把“反谢”“批判王、关、戚”定为“为二月逆流翻案”，把杨、余、傅说成是“天派”的后台。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反聂元梓浪潮在北京展开。

3月18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江青说：“现在有人要替去年的二月逆流翻案”。

3月20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会议上，吴德说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为二月逆流翻案，应有个明确的态度。有人用学习班的缺点、错误反对谢副总理，讲什么要谢副总理上断头台，谢副总理是变色龙等等。这是反革命。他们正是要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与二月逆流作斗争的谢副总理打倒，这不行。打倒谢副总理要让谁来当主任呢？让二月逆流的主将谭震林来？不行！让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主将来？不行！谁是二月逆流的主将，谁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主将？大家心里都有数。

3月24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林彪在讲话中说：“他（指杨成武）为了一个问题，跟了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讲。”林彪还说：“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都有他的份，他才是真正的后台。”3月27日下午，首都军民10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向广大群众公布了“杨余傅事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出席大会。领导讲话中提到对聂元梓要“一批二保”。上面有“势”，下面必然闻风而动。3月19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第二号严正声明》，《声明》说：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自领导下，新生的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粉碎了关王林穆反党集团和聂式家族、郑家黑店等叛徒、特务集团从极“左”和右的方面猖狂进攻。……当前我们与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之流这一伙二

月逆流派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3月20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石油学院的“北京公社”、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等组织相继到北大校园内游行示威，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示威游行。游行示威者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聂元梓！”“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3月21日晚，井冈山兵团派人抄了孙蓬一、陈葆华等人的家。同时，还抢砸了地质地理系文革办公室，劫走了全部档案材料，抢砸了北大汽车库，劫走了汽车一辆，割断了新北大广播台全部喇叭线，抢走了十七个喇叭，烧毁了十一个喇叭。

3月23日，新人大公社等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打倒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3月2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声明》。《声明》说：坚决揪出在其黑后台操纵下，为“二月逆流”翻案、炮打谢副总理、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小丑聂元梓！聂元梓必须交待与杨成武之流的黑关系。

同日下午，一些校外组织上万人来到北大，其中有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持大铁棍，有人说“到北大来看斗聂元梓”。当时形势相当严峻，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聂元梓强拉住谢富治到北大制止武斗。

井冈山兵团在外部强大势力的支持下，负责人头脑发热，仿佛“时来天地皆同力”。梦想“一切权力归井冈山！”，认为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死期已到”，“人心涣散，不堪一击”，就动起了武力摧垮新北大公社的脑筋。这就是3.28-3.29武斗的背景！

3月28日晚上，井冈山兵团派出武斗队，占领了40楼，抓捕该楼里30名手无寸铁的公社成员（包括红十团团长）。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万万没有料到，新北大公社会在深夜进行反击，采取中心开花战术，夺占了31楼。双方混战一场。具体过程我在《记忆》182期发表文章《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已经说清楚，不再赘述。

武斗发生后，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来北大制止武斗。29日早晨李将军和聂元梓一同来到现场。井冈山兵团一部分人围将过来。有人刺伤聂元梓，有人误打了李钟奇。李钟奇当场看到樊能廷举着东西，高喊：“有刺客！”，公社方面有人看到是蔡华江刺了聂元梓。

李钟奇在上午7点半和11点半在新北大广播台作了两次讲话，第一次讲话全文如下：

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8点；地点：哲学楼206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同志。这个凶手，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

第二次讲话全文如下：

新北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的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查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唐春景等七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查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晚上，两派代表开会。谢富治、温玉成（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参加。谢富治说：

“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并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

-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
- （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回，回去作自我批评；
- （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

3月30日 凌晨2点左右，李钟奇到新北大公社总部，听取对学校武斗的意见。李钟奇表示井冈山兵团要交出谋刺的凶手，如果不交，他要抓人。

4月1日 驻校解放军代表传达温玉成两点指示：（一）两派广播台坚决停止播放有关引起双方群众对立情绪内容的稿件；（二）严格禁止制造和向校内运送武斗工具。违者，以挑起武斗论处。

▲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一号动员令》，称：“刺杀聂元梓是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政治陷害”；号召其成员“要揭穿这个大阴谋”。

4月4日 李钟奇来北大，对调查组和井冈山兵团讲：井冈山一定要交出凶手，不交出我们誓不罢休。井冈山方面说刺聂是革命行动，拒绝交出凶手。

4月5日 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二号动员令》，说“聂元梓到武斗现场”，“被两派革命群众包围，被人刺伤”。

到现在，还是无人承认刺聂，更没有人承认打了李钟奇。

北大武斗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文革（包括王关戚）、谢富治等人，在北大制造政治分裂，挑动武斗造成的。用吴德的话佐证我的观点。吴德在其口述回忆中说：“……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

生了很多的事情”。¹吴德的话说得非常简略，但责任所在，应该是一目了然了。

也谈点“事实与逻辑”

俞文说：“毋庸讳言，文革后清算文革中的罪行和三种人确有政治倾向。同样的罪行，在政界有背景的逃过去了，没有背景的只能去坐牢。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人命，谁能把你送入牢房？”判了刑就有罪吗？地质学院王大宾，就是因为陈云的一句话，就被判了九年！“五大领袖”中跟“四人帮”最紧的是谭厚兰，她带人到曲阜砸孔庙，是政治问题，也是刑事问题，但却免于起诉。文革中被处死的遇罗克、林昭、沈沉有罪吗？

俞文说：“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据点里，关押过多达数百人的北大师生。”这种说法有事实根据吗？数百人关在武斗据点，看管的人是否也要有数百人，这是大客栈，还是武斗据点？俞文说：“众所周知，井冈山兵团没有牛棚，也没有在武斗期间往井冈山自卫楼群里抓捕关押过新北大公社成员。”事实是，1967年12月30日井冈山兵团抓走了北大教务长、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昆。直到1968年元月6日（在卫戍区的一再干预下）才放人；3月17日绑架广播台的编辑贾瑞珍（中文系学生），在28楼毒打及审讯；1968年3月28日武斗时，住在40楼的公社胜利团东语系学生王明美等人被井冈山关押到28楼。王明美在被关押时头部被铁棍砸伤、流血，不得不在凌晨被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²；抓捕、批斗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并关押在28楼长达数月，被你们放出来时，我恰好遇见，她已成了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白毛女”。以上这些仅是我所知道的。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² 王明美：《难忘的胜利团情谊》，见王复兴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第242页，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

关于牛辉林同学

俞文问：“牛辉林有什么罪？”牛辉林同学已作古，“死者为大”，我本意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作者一再提及此事，并且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与其论战，我不得不再说几句。首先，我要说的是：牛辉林是北大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我无权、也不想给牛辉林定罪，我能做到的，只是陈述事实。

牛辉林是北大文革中的名人。亲历北大文革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至于对牛辉林的评价，相信每个知道他的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牛辉林亲自介入打砸抢，至少有下面几件事：

1. 1967年7月10日带人砸、抄了校文革保卫组。

2. 1967年8月26日牛辉林亲自带人到光明日报，砸了《新北大》110期的活字版。

3. 王复兴校友在《从北大文革看“继续革命论”》（载《记忆》249期）一文中还提到了他：7月的一天，“公社”的“六六串联会”由笔者主持，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串联会，讨论形势。自称是“造反派”的牛辉林带领“红旗飘”十几个人冲进会场，牛辉林从笔者手中抢走话筒，然后把笔者推下主席台，并朝笔者胸口踹了一脚，使笔者跌倒在地。

俞文说：“牛辉林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在北大武斗时期被校文革抓捕关押逼供，被逼坠楼终身瘫痪）同为聂元梓校文革残酷迫害的难友，因而相识做了朋友，这是人之常情。他们做朋友，是他们的权利。”

什么叫难友？邓朴方同学受难时，牛辉林正准备“一切权力归井冈山！”呢。何来“同为聂元梓校文革残酷迫害的难友？”还是牛夫人唐竞同学说的确切，他们相识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唐竞在《怀念牛辉林》一书中写道：

当时在北大读书的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几乎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对他的情况都了解。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召开了“平反大会”，给他和邓朴方等多

位同学平反。在校时牛辉林与他们并没有联系，毕业多年以后，同学来山西时，总要看看他。比如毛主席的儿媳韶华……刚改革开放时，邓朴方曾经几次来山西，每次都约牛辉林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夜。……只是在受到诬陷后，才不得不去见邓朴方。邓朴方说：“全北大的人都成了‘三种人’，也轮不到你老牛是‘三种人’啊！”

校文革是搞了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的专案，但没有抓到过牛辉林。按牛辉林自己的说法：（1968年）6月中旬，井冈山总部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宣布与我划清界限、隔离审查。等到一个月后毛主席召见“五大学生领袖”北大武斗时，我已是被本校两派共同批判斗争的阶下囚。（《怀念牛辉林》书中牛辉林自述）说明首先关押牛辉林的是井冈山兵团自己，而后是宣传队，不是新北大公社。牛辉林与邓朴芳同时受批判（可称为难友的）是在宣传队掌权时期。

社会上对牛辉林也有不同评价。张木生在《山西出了个牛辉林》一文中写到：

牛辉林有胆有识也确有大智慧。他紧紧抓住毛主席多次对自己的评价，引导迟群、谢静宜重新认识自己，掩盖自己多次在小范围内表露出对林彪、江青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就是一个无知的“土鳖”。……自己只是一个紧跟毛主席，永远跟不上的落伍者。迟群、谢静宜多次找牛辉林谈话，双方拉近了共识：“牛辉林有严重错误，但还愿意改正错误，牛辉林和北大武斗没有关系”。牛辉林认真观察，仔细分析，他认定最后解脱自己的突破口在谢静宜身上。牛辉林认真品味迟群态度的变化，现在已不说“罪行”而用“问题”，不说“认罪”、“交待”，而说“反省”、“检讨”。攻下谢静宜，自己问题上达天庭的机会就来了。

谢静宜在北大哲学楼，在她的办公室找牛辉林谈话，牛一身大汗淋漓地站到谢静宜面前。谢从座椅上站起来问：“大冷天的，你很热吗？”

“不是热，是见首长心里紧张得厉害。”

“紧张什么？我青面獠牙吓着你？”

“不是，我没想到，首长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毛主席委以重任”。

谢静宜笑了，“你这孩子，还挺会说话，坐下说。”

在《管理向西门庆学习》¹一书中，作者在“某些人必须控制使用——陈经济最多只能当副总”一节中写到：

再如，山西省现任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牛辉林同志，他曾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期时逢文革，他以专搞分裂，自称是真正的造反派，后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并走上了造反派领袖的宝座，其影响空前，可从他这几十年的工作之所以没出大问题就是我党“控制使用”的结果。（第37页）

“在诚信是最基础的投资——武大郎为什么生意好”一节，作者写到：

在这里谈诚信，我还得列举“牛辉林”同志的例子，也便于同前面提到的他必须“控制使用”对应起来，牛辉林同志即将要离开领导岗位，可是他对自己的一生非常的不满意，总觉得没能碰上好的机遇。在与他相识后，一见如故，经过多次的沟通与交流，共同签订了排他性的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把“中国黄河电视台”与我公司及社会的资源整合，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尽快让黄河电视台在国际上占领一席之地。随后，在我公司的配合下让他与马万祺家族就合作达成了共识，且签订了协议。遗憾的是，从此，他不仅不把签订的协议返回，就是每次与他联系都以开党组会为由不去履行协议，直到不接电话，更谈不上见面了，可这给合作者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其实，这说明他缺乏诚信，也缺乏做人的基本准则，或许这正是他今生未能真正成功

¹ 冯成略著：《管理向西门庆学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1月。

的根源吧！（第55页）

俞文写道：“在牛辉林毕业离校后，由于反井冈山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没有他们，8341部队怎么会想起牛辉林？）的关照，牛辉林又被揪回北大，审查五一六问题。”

事实是：1970年3月，北大老五届全被发配离校。此时，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正式宣布完成。这场持续多年的清查运动，有极大的任意性，被指为“五一六”分子及其后台的人不断变换和增添，并株连大批亲属。¹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执掌北大大权的8341宣传队将已毕业分配的牛辉林、胡宗式等多人先后揪回学校，进行长时间的审查或批斗。请问：没有新北大公社的人的关照，8341就不知道牛辉林啦？！

说牛辉林“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不是我杜撰的，而是牛辉林的夫子自道。在《怀念牛辉林》一书中牛辉林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在这两年关押中肯积极配合，除了8341办案善待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工作、工资关系一直在神山没动。我始终抱着一个平平安安回去当公社干部的愿景。

“肯积极配合”是什么意思，不难理解吧？1971年3月4日宣传队在办公楼召开自首坦白大会，牛辉林第一个上台坦白。他坦白了三个问题：（1）说了江青的坏话；（2）说洪涛发展他参加了“五一六”，他又发展了其他人，并说“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宣传队。攻守同盟是不可信的，赶快坦白交待吧”；（3）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指使下，在北大策划武斗。

在牛辉林的“积极配合”下，宣传队给了他“犯严重错误，保留团籍”的结论，并在1972年10月较早离开北大。而聂元梓、孙蓬一却因不“积极配合”，1973年3月1日被开除党籍，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残酷批斗。

¹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8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关于六十三军

俞文说：

4587 部队（六十三军的番号，当时军部驻石家庄）指挥的“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工宣队”或“军宣队”。六十三军在文革中与北大校文革关系极好，他们几次派军队干部来北大主持军训，支持校文革的行动。在主管宣传队统治北大 7 个月期间，六十三军与聂元梓及其下属站在同一立场，接过校文革的秘密档案，在北大整了九百多个反革命专案，数以千计的师生员工被整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或者反革命集团外围分子。其中著名者有：

继续迫害在校文革时期就被残酷迫害的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侯汉清、牛辉林、谢纪康、徐运朴等人及其骨干成员。校文革在武斗期间为了摧毁井冈山，在全国各地与他们家乡的当地政府和造反派组织联系，以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诬陷、迫害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亲属，给他们造成严重身心创伤，有些亲属被迫害身亡。六十三军统治北大期间继续对这些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迫害，成立审查专案，诬陷他们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拉上全校大会批斗。

六十三军做到了校文革在掌权期间没有做到的迫害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暴行。……六十三军的军人大老粗完全不理解当时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召开九大收割文革果实的战略计划，在北大大抓反革命集团，实际上打乱了毛的计划，引起毛的恼怒。毛在 1969 年 3 月派出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团的番号，是毛的御林军），收缴六十三军的权力，改变北大宣传队的执政方针，直接执行毛的指令。所有以上九百多个专案全部撤销，所有文件火焚销毁，所有被关押人员全部释放。至少在表面上，北大终于风平浪静了。

对于这么一大段文字，容我慢慢说来。

首先，六十三军在 1967 年 1 月，是按军委的命令，来北大搞军训的。在搞军训之前，

和北大同学一起，执行清理外来人口，恢复北京站运输秩序的工作。随后，又和我们一起参加夺权。在高教部的冲突中，有的战士还挨了打。通过军训，实现按班级、按系统的大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我们和六十三军关系好是必然的，但是这不等于1968年8月宣传队进校以后，六十三军就听聂元梓的。军队是讲服从的，北大的事情六十三军军长说了不算，至少是北京市革委会才有权下达指示。说：“在主管宣传队统治北大7个月期间，六十三军与聂元梓及其下属站在同一立场”，纯属无稽之谈。

校文革搞了三个“反革命小集团”的专案，涉及井冈山方面20余人。这些人有针对中央文革、毛泽东、林彪等人的言论。现在看应是无罪，可在当时是属于《公安六条》的范畴。六十三军能不管吗？清理阶级队伍，是党中央的指示，六十三军能不执行吗？校文革整井冈山方面20余人。六十三军整了九百多个专案，请问俞先生，你有什么证据说“接过校文革的秘密档案”？翦伯赞夫妇的死，直接原因是中央专案组，不是六十三军。早有多篇文章把此事讲清楚了。

工军宣传队进校，打着“毛主席亲自派来的”旗号，实践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使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宣传队的口号是“清查陆平黑班底”，矛头所向，首先是干部和教师队伍，连教研室组长和陆平树立的学习标兵，都在清查之列，打击面之宽可以想象。很短时间内便有二十多人自杀。文革开始两年多了，这些人一直没有自杀，为什么要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自杀？笔者认为，这与某个军或某个工厂的宣传队并无直接关系，与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无直接关系。这是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换成别的军或工厂的宣传队，情况也会一样。1968年7月27日，8341部队率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在随后的清队、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共有24人自杀，其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自杀19人。¹

宣传队关于“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说法，和毛泽东先前认为北大是一个“反动堡

¹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名单》，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启之编-台北市：独立作家，2014.03

垒”、“池深王八多”是一致的。这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其目的就是要结束“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派性角度出发，把北大“清队”说成是一派压一派的观点，既不符合事实，更是掩盖了“清理阶级队伍”错误的本质。

六十三军驻地在石家庄，他们在石家庄支左，局势是稳定的。石家庄有一派“狂人公社”（后改称鲁迅公社）是反六十三军的。北大井冈山是“狂人公社”的支持者，“狂人公社”也是北大井冈山的支持者。1967年8月17日，在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大会上，“狂人公社”代表十四个组织联合发言，祝贺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兹将其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战友们，外地造反派日夜仰望着北京，对于首都的群众组织，谁革谁保，地方上看得很清楚。大量的事实说明，“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黑风前资产阶级开始向无产阶级反扑的产物，这是为二月黑风准备的一支组织力量。二月黑风以来，它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到处扶植老保，镇压革命造反派。他们镇压过钢二司，镇压过川大八·二六，镇压过河南二七公社，镇压过湘江风雷。在河北，它的黑手伸向了邯郸、邢台、张家口、唐山等地，给这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同时也伸向了石家庄，猖狂地镇压石家庄的“狂人”。但是，几个嗡嗡叫的苍蝇吓不住革命“狂人”，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从三十人发展到十万余人。今天，我们要向新北大公社挑战。聂元梓、孙蓬一你们敢展开一场辩论吗？新北大公社渣派们，有胆量吗？大量事实也说明，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奔波于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与我们共同战斗，与我们血雨同舟，在此，我们代表石家庄十万“狂人”、河北八五风暴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们誓与你们战斗在一起，流血在一起，牺牲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狂人的主力，是石家庄铁道学院，他们在1967年元月17日冲击解放军报。北大校文革曾开广播车到现场发表声明，反对冲击报社。这引起一些单位（如铁道兵工程学院、大

连海运学院)不满,多次到北大闹事。1967年1月27日北大“动态报”有过报道和评论:

这是为什么?——值得注意的动向

26日下午,铁道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装甲兵工程学院、交通部的大汉们,也相继冲来,恶毒地说什么“刘主席派工作组,中央文革派你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什么“冲解放军报社是革命行动”,狂嚎“打倒一小撮铁杆保皇派”,向北大革命师生示威,还公然咬伤我革命同学,挑起武斗的严重事件。大连海运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四、五十人还冲进我夺权指挥部,气势汹汹,蛮不讲理,扬言“我们就是要搞一搞大北大主义”,“管一管你们的修正主义办公室”,并非法将我办公室二人绑架,由楼上拖到楼下,还大骂解放军是“保皇派”。在高教部,他们还唆使大小喽罗,贴出反动的大字报,说什么“聂元梓的反造定了”、“想保聂元梓办不到”、“不把北大所谓夺权兵团赶出高教部我们誓不罢休”,肆无忌惮地制造反革命舆论。不过三日,他们这一小撮接踵而来,其调子如出一辙,面目何其相似!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铁道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校、大连海运学院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同北大素无瓜葛,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对北大的攻击?

实际上,他们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保卢正义,帮助卢正义一伙在教育部和高教部夺取权力。支持卢正义的正是王、关、戚、林杰、吴传启一伙。铁道兵工程学院的那些穿军装的人,居然同卢正义一伙搭上了关系,如果他们不是受人愚弄、代人出头的话,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看来,支持谁、反对谁,还是有渊源的。

1967年1月8日,六十三军进入北大,完成军训任务后,2月16日大部分撤出北大,留下少数人员继续工作,到9月17日全部撤离。在他们撤走以后,直到武斗期间,再没有他们的身影和表态。这少数人员在北大作了什么工作?他们见证了聂元梓、孙蓬一和新

北大公社反对吴传启一伙的斗争，以及陈伯达六五讲话之后北大出现的乱局；孙蓬一被对立派围困时，有几次是六十三军的同志解救出来。

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支左，是中央的命令。文革以来，军队承受巨大压力和冤屈。今天我们写文革史，一定要看清，责任在中央，不能把北大的错事都加在六十三军头上。

也谈给井冈山兵团的定位

俞文说：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对井冈山兵团的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文革中两派互相指责，无限上纲是常有的事。我列了下面这个表，从中可以看到相互间的称谓：

时间	公社对井冈山的称谓	井冈山对校文革、公社的称谓
1967年9月1日前	牛辉林之流，老保组织	二流派文革、二流派公社、三保（保陆平、保张承先、保聂元梓）、“鞋社”
1967.9.1 ~ 1968.1.1	井冈山是老保翻天的后台和支柱 井冈山兵团是林杰反党集团的私生子，牛辉林之流是关帝庙的小和尚。	聂孙文革纵容北大老保翻天 聂氏家族、郑家黑店（注，指民族学院郑仲兵，把新北大公社的战友也给捎上。）
1968.1.1 ~ 1968.3.20	井冈山兵团是由一小撮坏头头控制的群众组织	陆平保皇党和坏人孙蓬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急先锋（新北大报3.22，第二号声明）
1968.3.30以后	操纵北大井冈山的反动小集团 坚决揪出井冈山兵团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1968.4.8）	反革命小丑聂元梓（地质学院东方红声明）
4.23（陈焕仁日记525页）	井冈山兵团就是国民党，公社跟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聂元梓操纵的新北大公社，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井冈山同公社的斗争，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

表中的“鞋社”，是“破鞋社”的简称。反聂派常骂聂“破鞋”，推演出新北大公社为“鞋社”。不只口头骂，还有行动。季羨林《牛棚杂忆》云：“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忽然从大饭厅支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我国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爷’就有这么一

个绰号。……同样成串的破鞋，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户外边。其用意完全相同。这些小小插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¹国学大师津津乐道于此，可见趣味之高下！

事实上，北大的反聂派在外部某些势力的支持下，战斗力极强，从来不缺乏造反精神。抢档案、抢大印、抄二组、割电线、偷喇叭、冲会场、抄孙蓬一等人的家、围追孙蓬一、殴打谢甲林、绑架崔雄昆、搞绝食、玩静坐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在现在的文章里全部“归零”！他们参加的文革历史，变成了反聂的英雄史，而反聂永远正确。

官方笔下的北大文革

聂元梓在1998年10月在《聂元梓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一文中写道：

我在文革中最应该向全国人民检讨的是那张被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到风口浪尖，点燃造反之火，燃向全国的那张大字报。我和几人合写的那张大字报，的确起了煽动全国各地各单位，起来造党委的反的恶劣作用。我对这张大字报自然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牵头写的，思想也是当时我的思想，没有谁指使或让我牵头写这张大字报。

《记忆》234期发表了夏剑彖、高云鹏的《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一文，清楚地说明：大字报本身没有康生的指使，是他们七人根据《五一六通知》自发酝酿写出的。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掌权。他们无视历史事实，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定，误导人们探寻历史真相。关于大字报的形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中央组织部1980年8月21日在《关于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并组织人炮制《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诬陷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同志，这是一起冤案。

¹ 《牛棚杂忆》第4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转的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和其妻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把康生说成了第一张大字报的主使者，就是为毛开脱罪责。

1998年出版、2008年又修订的《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等人主编）的文革部分，就是紧跟上述官方政治导向的代表作。它把北大文革写成“反聂”与“保聂”的斗争，混淆了文革的真正本质，也阻碍了对真相的探究。

《北京大学纪事》这样记叙：“（5月25日）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

据《毛泽东年谱》：1966年5月29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已经决定派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¹。这是在大字报广播的前两天，也就是说，扳倒陆平，不只是毛的意见，也是刘、周、邓的意见。显而易见，不存在康生背着刘、周、邓的问题。向毛报告大字报的事，是他的职责。

在《北京大学纪事》中，找不到聂元梓带领北大和北京市部分群众组织向关锋的基层势力吴传启们进攻；找不到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和1968年春发生的“反谢”风波；找不到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时持慎重态度、被扣上“二月逆流派”；当然也找不到1968年春聂元梓被扣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元凶”，等等。

俞小平的态度与王效挺等人有相似之处。其在《记忆》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里，同样找不到新北大公社向关锋的基层势力吴传启们进攻，找不到新北大公社反谢富治，更找不到井冈山兵团给校文革扣上的“二流派文革”、给新北大公社扣上“二流派公社”的说辞。北大井冈山与王、关、戚的关系，是否“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侯汉清早在1967年9月

¹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

中旬，就对胡宗式讲了：“看来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

结语：一句很到位的话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被毛利用，在全国掀起文革巨浪，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这是大字报作者们无法预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使绝大多数的干部受到冲击，一些人受到皮肉之苦，甚至失去生命。他们及他们的亲友有怨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些受害者不敢、不愿批判毛泽东，就罪及聂元梓及其他造反派。文革后继续整治聂元梓的是邓小平、彭真。这是人们都清楚的。

文革中的聂元梓没有完全紧跟毛的部署，节外生枝地反了王力、关锋。聂本意是为毛“清除佞臣”，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纯洁性。然而，在毛看来，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少壮派，是他推进文革极左路线的得力工具。你反他们，表明你不是一条心了，成了前进的绊脚石。井冈山兵团正是清障工，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搬掉这块绊脚石。所以，文革中首先整治聂的是毛泽东，他给北大校文革扣上“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三顶大帽子。

俞文写道：无论文革中的毛泽东，文革后的邓小平和陈云，或者是文革后复职的老干部，井冈山兵团都不是他们眼前的挡路者和事后的报复对象。毛泽东、邓、陈或者老干部们为什么要清算井冈山？——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点明了北大双方争论的实质。🔒

【序 跋】

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序一

启 之

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是乌托邦的祭祀，毛时代的牺牲。“青春无悔”固然可以换取安宁，但是这种“认知失调”不过是自我麻痹。“选择遗忘”固然可以免于失眠，但

它逃避了痛苦，也逃避了责任。

回忆往昔，追索因果，付诸文字：苦痛而艰难。核实真伪，联系出版，编辑出书：繁琐且劳神。自掏腰包不说，还要顶风冒险。而在这期间，如果你有什么差池，往往怨声四起——一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啥也不干的，是好人。一旦干点事，指摘就来了：说你想出名，说你有派性，说你有支配欲，说你自己不消停，还不让人家安静……所以，编这种书的，不但要有勇有谋，还要有境界，有涵养，有胸襟，有担当。

在北京高校的老五届中，不乏这种自找苦吃的人——清华有孙怒涛、唐金鹤、胡鹏池……北大有胡宗式、章铎、王复兴、张从……地院有蔡新平、孟繁华、朱德瑜……人大有高宁、李豫生、陆伟国……北师大有刘明、赵惠中、蔡鸣乔、丛立新……北师大虽然姗姗来迟，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低。

这文集的作者，有的我见过，有的只是神交。这文集集中的文章，有的早就读过，有的第一次看到。无论认识与否，无论文字高下，这些人都值得敬重，因为他们有承担，有历史感。他们知道，与其歌颂母校之荣光，不如牢记师道之耻辱。“‘文革’不是‘国难’而是‘国耻’。‘国难’是外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国耻’是中国自己折腾自己，自己作践自己。”^①其作践的，首先是自己的人民，而人民之中，首先是精英，是文化人，是知识分子。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反思文革，就要记住“国耻”，而记住“国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汇集成书，付之梨枣，传之网络。

近十年来，文革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从通史转向专史；二是从官方转向民间，三是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专史是通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专史包括地方史和单位史。单位史首先是高校史。校方编写的大事记，对十年浩劫，或遗漏，或曲解，甚至只字不提。《北京师范大学111年发展历史大事件概记》，从1959跳到1978，1960至1977只字不提。这18年间千万人的苦难，近百人的死伤，学校的混乱，学业的荒废，煌煌校史置若罔闻。^①官家编撰的高校史中的文革，既粗陋，又浮夸，以弄虚做假为能事：“1966年后，师大经历了10年动乱的浩劫，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北京师大广大师生员工忠于职

守，坚持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绩。”^②这54个字来自北师大校史。师大红卫兵在曲阜的暴行，极左思潮对教育的破坏，斯文扫地，文化倒退，堂堂校史视而不见。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官府、高校、校史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几十年来的主旋律无非就是掩盖“国耻”，充沛天地之间的“正能量”，无非就是粉饰“国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造着新的国耻！

退休之士、草根之民，有大音声起——清华、北大、地院、人大，以及北师大的老五届，用自己的行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有学术价值、秉笔直书的高校史，在闺阁不在庙堂，在民间不在府衙。

高校史的基础是史料的整理和亲历者的回忆。而最重要的亲历者是当年群众组织的领导。北师大之所以落后于清华、北大和地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派头头的缺席——“井冈山战斗团”的头头谭厚兰病故，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沉默。三年前，我曾与这位一把手见面，劝她写写当年。她说忙。她的先生告诉我，当年为了逃避“现反”的命运，他逃出母校，逃离北京，没有钱没有粮票，靠做木匠活儿，打黑工维生，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他的叙述，让我知道了，当年北师大造反兵团受到的迫害，兵团成员处境的危殆，票证时代生存的艰辛。把这些经历用一个“忙”字雪藏深埋，很符合“宜粗不宜细”的歪理邪说，但是一个时代的不公，一个群体的苦难，也随之消逝在历史的黑洞之中——最应该说话的没有说，是这本文集最大的遗憾。


编《记忆》的经历告诉我，高校史的编著者是“三多一少”。

三多：一是亲历者多。这些人多是当年的大学老五届。二是老者多。他们都是40后，年纪都在古稀以上。三是业余多。这些人所学专业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出身文科的占少数，学历史的更是寥寥无几，以本书为例，刘明、赵惠中、蔡鸣乔全是物理系毕业，蒋世信学的是数学，他们的专业离史学远得不能再远，他们投入文革研究，不是教学的需要，不是领导的安排，而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他们不但挣不上钱，评不了职称，还要做出各种牺牲

——从贴钱费力，到失去安全感。

我所说的“一少”，指的是中青少。80后，90后不必说，就是60、70后关心高校文革史的，也极为罕见。这“三多一少”意味着，民间学者任重而道远。

“师劫”二字，沉重而深邃。它以极简之笔，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的本质。人生是一个长征，此文集的作者们，用晚年的步武，丈量出人生的意义。用余生的光和热，温暖了后人，照亮了历史。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文集（二）的问世，而所有的雪藏深埋，都会付诸笔墨，留诸后世。

【序 跋】

平民子女的愚忠、求索与苦难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序二

刘 明

北京师范大学老五届的第一部文革回忆录终于面世了！在我看来，它来得太晚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10月结束至今已经过去42个年头，我们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古稀老人，一些重要的当事人过世了，许多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文革经历的男女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清华、北大、北京地质学院老五届出版了大部头的集体回忆录，更有几十上百部的个人回忆录面世。北师大作为当年处于最前线的北京五大院校之一，为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冲锋陷阵，做出了毫不逊色的“突出贡献”，本应有同样分量的论著问世，但迄今仅有零星的回忆文章发表在《记忆》等电子刊物上，其回首反省之人寡势单与当年讨孔反逆的雷霆万钧如此不协调，委实令人遗憾，并不得不思索其中的究竟。

聚集在本回忆录中的作者少数来自于北师大的非老五届，个别来自于校外，大多来自于北师大老五届的各系各年级，工作生活于东西南北，相距数千里，是反思文革的共同意

向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历经多年的联络、构思、发动、搜集、写作，方形成了这样一部回忆录。尽管我们已经极大努力，但集子仍然差强人意。其直接原因来自多个方面：校系档案馆（室）“谢绝入内”；以谭厚兰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当事人已经离世；以林杰为代表的一些重要局内人病重无力参与；两派的若干知情人不愿提笔；更多的同学或者认为回首当年“痛苦不堪”，或者认为会搅动那滩终于归复平静的“死水”重新掀起汹涌波涛，或者认为历史一去不返理应目光向前……如此种种，回忆录的硬伤软肋在所难免，期待当事人、知情人、研究者补充指正。但愿她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来日后北师大文革回忆反思录的第二集、第三集……问世。

我们之所以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推出这样一部回忆录，就在于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虽然中外知识界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政治——社会破坏运动，学术界也有多部论著问世，但迄今在史实的揭示、背景的开掘、理论的探究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到位。相反，近年来倒有一阵阵反攻倒算的邪风扑面而来。先是有“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导致内地几千上万家报刊杂志社电视台出版社中，居然没有一家能够继续发出响应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声音。惟愿我们的这部回忆录能和近年来通过种种其他的渠道面世的回忆录引成合力，多少弥补上述亏欠，并引发北师大人更广泛更深入的回忆与反思。

一 北师大造反运动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武兼备的和平时期的内战。如果将战争划分为红蓝两方，那么，毛泽东就是“红军”的统帅，“五一六通知”“16条”是“红军”的行动纲领，林彪、周恩来等组成了司令部，“中央文革”则是其前线指挥部。“红军”由直属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有机分工构成。“蓝军”则是由毛泽东认为的阻碍他再造其乌托邦社会的所有现实+虚拟障碍组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各个文

化领域的封资修反动思想……如是，我们可以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所代表的五所高校比喻为五支突击队，它们率先向“蓝军”特别是其司令部发起了冲击。体现在文革全过程，尤其在1966年6月—1968年7月的文革狂飙时期，每支突击队在介入中央机关和地方革命造反运动，以及应对校内反对派的挑战，其所选取的主攻方向、运用的出击技巧、产生的效用品味，均呈现出明显的反差。因对其内情知之不详，暂且不讨论作为“天派”“地派”名称来源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仅就其余三校做些比较。

北师大、北大、清华等三支突击队，虽然都是在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战略部署，在下依靠在校的非黑五类青年学生等基本群众，代表红卫兵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各校运动均极其惨烈，尤其表现在都发生了数十起师生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北师大详情见本书丛立新的专稿《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且都分裂出强弱不等成建制的反对派。但由于初创方式、领袖个性、核心圈成员结构、可利用政治资源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中枢层面的重大差异。

北大的文革肇始于1966年5月25日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大字报反映的是支持——批评陆平的两派在此前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思想政治分歧；聂元梓本人是抗战期间奔赴延安的老干部，经过二十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政治经验丰富老道，其家族具有深厚的党政上层背景；聂元梓的核心圈是以孙蓬一为代表的中年干部和教师；以李讷为代表的若干离校或在校的高干子女向其传递高层的情报信息。

清华的造反派肇始于1966年6月蒯大富等青年学生批评叶林——王光美工作组而遭到严厉整肃，批评——被整肃反映了围绕如何开展文革的方式方法分歧；蒯大富本人是地方中层干部家庭出身，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不畏权势，妄自尊大，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蒯大富的核心圈亦以学生为主，辅以“红教联”为代表的干部教师；一大批高干子弟在不同阶段主导或者制约了清华运动的走向，影响深远。

而北师大的造反派渊源须追溯到1966年春，《红旗》杂志借调谭厚兰等几个政教系、历史系学生帮忙加强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谭厚兰自此搭上了林杰——关锋——陈伯达、康

生这条“红线”；谭厚兰本人是贫农出身的调干生，老实听话，言辞木讷，能力平平，欠缺政治斗争经验；谭厚兰的核心圈由低年级学生和几个政教系教师组成；北师大几乎没有高干子弟，可借助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

由于校情不同，上述三校所收受的指令系统也同中有异。“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这是同。通过李讷、江青等渠道，聂元梓可能较多地直接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临清华，听取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汇报，并亲自给蒯大富等人平反，“中央文革小组”从来没有集体驾临过清华园；北师大则自1966年6月2日谭厚兰等人贴出第一张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直至1967年8月末，没有哪个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能比谭厚兰派接受更多更直接来自“中央文革”的指令，而且谭厚兰也没有其他的指令来源。“谭厚兰是有保姆的左派”，“林杰是谭厚兰的保姆”，为北师大校内外人所共知，这是异。（1966年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驾临北师大时，康生说：“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是个好学生，你们的一个好同学！还有人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个后台老板是我呢！”）我们这部回忆录所记述的，就是谭厚兰率领的这支突击队——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井冈山公社，兴衰成败的历史轨迹。

从1966年6月谭厚兰初次现身到1970年5月“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谭厚兰被隔离审查，整整四年时间。我们可以把她及她所代表的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与井冈山公社的兴衰划分为三个时期：1966年6月—1966年10月初掌权为初创时期，1966年10月中—1967年8月为鼎盛时期，1967年9月—1970年5月为衰败时期。在初创时期的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利用李**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挑起通宵大辩论组织队伍；在鼎盛时期的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教育部夺权与聂元梓“新北大”发生冲突……尤其是1966年11月发动“讨孔—捣毁孔家店”，1967年3月率先“炮轰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等震惊全国的活动中，均有“中央文革”在背后的策划、指挥，最少也是支持。1967年8月末林杰随同王力、关锋突然倒台，谭厚兰如丧考妣，成为“断线的风筝”，立即失去了势头急剧衰落，除去在1968年春逆造反兵团“倒谢”而“挺谢”而

“围攻工五楼”之外，再也没有发动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正因为在其鼎盛时期，谭派无条件地效忠，“中央文革”也给予了她其余四大领袖所未曾享有的回报。一是在1967年5月5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报道，并附有毛泽东肯定性的批语。5月16日，正值《五一六通知》通过一周年，《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面向全国褒奖北师大左派；二是在1967年6月20日，谭厚兰以“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姚文元出访“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三是根据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在北航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同时，1967年8月18日，师大革委会发出公告成立军事委员会和井岗山民兵师，同时举行了授枪仪式。而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其他北京高校都未能享有如此信任和殊荣。

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谭厚兰和当年与她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友们，自1967年8月林杰倒台之后一步步被夺权——批判——惩处：1967年“九七”事件中谭厚兰和北师大革委会被中央保了下来，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同时强调：事态“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可以说，谭厚兰们是沾了投鼠忌器的光；1968年10月，谭厚兰与一批“问题学生”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1972年4月整个谭派在“批清五一六运动”中被彻底整肃，其骨干分子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保外就医，回到湘潭老家；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以王力、关锋、林杰倒台为界，谭厚兰及她的拥戴者的命运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冰火两重天”这个词组的含义，他们的关系委实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二 平民子女及其三无

今天，当人们回首历史之时，往往关注的是刘、林、江等上层人士在文革风云中潮起潮落、浮沉生死的命运。这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的职业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最终落败以致悲剧谢世，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斗争的原始性、野蛮性，他们的命运可悲可叹令人扼腕。但同时，也正是这些上层人士在其上升得势的阶段，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制造个人迷信，建构了对党内外不同意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控制模式，他们创立并曾受益于这个体制，最终也是被同一体制所吞噬。即便在身后，因这一体制仍在有效运作，其在政商各界仍然资源深厚，自然有人去寻访遗骨遗物，修缮其故居，力争其历史地位，并以“总不会挖我们的祖坟”为名义，高规格安排其子女以官位，或为其经商谋职提供便利开辟方便之门。更不必说那些虽遭迫害，但终归熬过了这场劫难的更多上层人士及其子女，在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凯歌高奏，官禄德尽收囊中的喜剧了。

反观无辜或曾被冠以“罪错”的平民及其子女，如果他们在文革等劫难中离世、伤残、被抄家、被遣返……除去少数人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得以落实政策聊补精神物质创伤之外，多数人只能默默承受曾经的苦难，以“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自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无数过世者早已被时间埋没，好像他们从来未曾在世间存在一样。

这一切，难道是公平正义的吗？

如是，再来观照以北师大老五届为样本的平民学生。这是一个京城三无群体（无知、无助、无奈）：无知：舆论一律的环境中，中共、苏共、国际共运的历史及中共当下的党内派系分歧，全是按领袖的意愿所构造。对于引领人类文明进程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系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先进文化思想，或者是一片空白，或者正误完全颠倒；无助：想要了解外部信息没有渠道，想要获取帮助在权力人士-权力部门中没有关系。关爱我们的父母亲朋已经自顾不暇，对于子女的起落沉浮受苦受难爱莫能助，我们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自作自受；这和刘涛、贺鹏飞、陈小鲁、宋彬彬等一批高干子女完全

不能同日而语——即便在落难时日，他们的内心备受煎熬，但厚重的关系网络仍能借助权力在明里暗里施以援手；无奈：十七年一贯的思想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政治挂帅，又红又专，要求我们遵照刘少奇的《修养》：做“驯服工具”，做“齿轮”“螺丝钉”；遵照林副主席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求我们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到我们始终生活在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之下，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始终是“成绩不小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然而，我们毕竟还是人，还有人性，有对人性真善美-假恶丑的超政治判断；我们还识字读书，还具备常识，会运用以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为基要的形式逻辑。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奈的尴尬之中：人性-党性如何两全？常识逻辑——诡辩逻辑（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与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并行不悖；“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上令下行是典型的两例。赵惠中在本书中《关于“6.20事件”的补充与思考》亦有精彩的讨论）如何统一？

三 平民子女因求索而苦难

由于每个人的条件——父母给定的初始条件和生存环境规定的边界条件不同，以及性格和悟性的差异，每个人处理上述巨大尴尬时就有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人选择只“信”不“疑”，以“信”克“疑”；一些人选择“信”中有“疑”，“信”不忘“疑”。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以“信”为本突出表现为“愚忠”，保留“质疑”突出表现为“求索”。诡异的是，对立的两种选择都以苦难为结局。

应当承认，长期一贯的政治教育让我们几乎全部平民子女都成为“愚忠”（开放改革条件下，那些信誓旦旦表态“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个别人，则是一批伪忠者）的孩子，但愚忠的程度有显著的高下之别。让笔者以数学上的幂次来将愚忠拟定量化。借用市井百姓讥讽某人做事不灵光、脑子缺根弦的说法：“是个贰”，可以给愚忠赋值为“2”。

完全克服了愚忠的圣洁者是极端少数，他们的愚忠是0次幂，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他们以文明的是非为是非，林昭、顾准、张志新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愚忠是1次幂，我们真诚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但认为其他人都可以批评怀疑，愚忠值即为2；在文革的狂飙时期，很多人的愚忠是2次幂，他们还真诚地忠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其愚忠值为4；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不少人的愚忠是3次幂，他们再进一步，还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其愚忠值为8；接下来，还有愚忠的4次幂、5次幂……幂次递增一人数递减。谭厚兰的愚忠大约在4次幂，其愚忠值为16。而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假革命的分水岭》表现出来的愚忠则是畸高的N次幂，他们为了拉帮结派已经变态痴狂了。这些高幂次的愚忠者，自欺欺人的工具只能是诡辩逻辑。

但是，大多数平民子女并没有失去人性失去理智，于是引发了低幂次愚忠者针对谭派高幂次愚忠者的一轮又一轮辩论与抗争，它突出表现为造反兵团与谭派的分裂和此后的一次次文争武斗。所以说，北师大两派之争的本质就是同为革命派（1966年10月1日，《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发表之后，原来保工作组的保守派顷刻土崩瓦解，投向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理智尚存的低幂次愚忠者——造反兵团与丧失理智的高幂次愚忠者——谭厚兰井冈山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表面看来，谭派之强大与兵团派之弱小简直不成比例，故掌控全局的毛泽东在1968年7.28接见五大领袖时说：“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想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其实，造反兵团的弱小仅是表象，它在学校里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它要求独立于林杰，质疑谭厚兰的领导能力，脱离谭派井冈山重建组织，炮轰谢富治……均获拥众多多，其中不少人身份是井冈山公社的，但内心却倾向兵团，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海派的出现为一例）。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多很多人没有正式加入，或者加入了，没有

积极参加活动，尤其是没有参加1968年春夏工五楼的两派武斗。造反兵团的理智尚存，还体现在它存在期间，除非自卫，从未发起和参与过激的造反活动，也不曾迫害校内外的无辜大众。所以在“清查五一六”“清理三种人”运动中，兵团人士均未涉及大案要案，这是值得肯定与称道的。在至今背景不明的1971年“4.26”抓捕行动中，兵团人士被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却又一无所获草草收场，突出反映了文革的法治荡然无存和“莫须有”畅行无阻。

我认为，这样一种低幂次愚忠与高幂次愚忠之间的斗争构成北师大两派之争的一个独有特色。而五大高校中的其余四校，无论是分裂为两大派的北大、清华，还是一片独大的北航、北地，各派组织都是低幂次愚忠革命派组织，两派之间的争斗也只是在低幂次愚忠的共识前提下，革命造反的方式方法政策策略之争。所以说，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独特性和对它兴衰过程及其因果探讨之缺乏是文革史研究的不足之一。

造反兵团对抗谭派仅仅是低幂次愚忠者表现其常识理性的方式之一。在当时极其专制封闭的条件下，北师大老五届中许多理智尚存勇气尚存的同学，在文革不同的阶段更采取过种种不同的形式，表达独立于发动者、鼓动者、指挥者及掌权执行者的观点，要求明辨理论是非，批评个人崇拜，质疑大人物的言行举止，探讨社会发展方向……总之，他们在力图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思想者，作为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向往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活。我把上述这一切统称为不甘盲从者的求索表现。以下略举几例：

①中文系四年级金宏达署名时汉人，1966年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姚文元文章《对于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康生批示：此文“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之后，关锋、林杰等通过《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对时年21岁的金宏达展开一轮轮高调批判。文革高潮中金宏达再屡经磨难。②物理系三年级杨以鸿、刘中柱，1966年12月贴出一张大字报《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要同“志壮坚信马列”的“林副主席”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讨论一下“顶峰论”问题，之后立即被隔离审

查监禁批斗。导致杨罹患乙型肝炎。1980年杨以鸿考取首届C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后在非线性光学与红外激光等领域做出了令国际同行重视的工作。1986年回国。劳累过度且因早年肝炎转化成肝癌，1988年病逝，年仅41岁。③数学系二年级李世取（化名黑牛）先是贴出《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就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自己个人的“几点建议”。之后又贴出大字报《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为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他自知厄运难逃，甚至留下了遗书，准备直面死亡。从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释放后，李刻苦自学数学，1979年考取母校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后晋升教授，聘为博导。④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李文博，1966年10月贴出大字报《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鼓吹大民主前提下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谭厚兰派则指责他鼓吹无政府主义。“12月黑风”中，他只是在同学给林彪贴的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便老账新账一起算，被打成“反动学生”剥夺自由，强制劳动。此外，还有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书写“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蔡鸣乔对于康生所作所为的质疑……不胜枚举。

广义的求索行为在各系各年级都有，且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的质疑或抵制：对于以压顶之势鼓动全民学习毛著，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两党论战等公共事务，对于林彪、江康陈等文革小组成员等公众人物，对于家庭中发生的某种非常变故，相关人员的言行不符合那个非凡年代的“政治正确”标准，或者以生命抗争来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一切均为法治条件下的公民权利所允许，都应当视为对那条非人的极左路线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反抗，都是在期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正常国家，在向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正常社会，都是合理合法的正常行为。但在当时，却遭到批判整肃，被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的学生，数不胜数，比例不会低于常常标定的5%。还有那些“黑五类”子女，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甚嚣尘上之时，曾被视为“狗崽子”；出于团结大多数的考虑，不得不否定这个血统论的口号。但在整个文

革过程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始终是一个负面的冠盖，其指称下的青少年在升学、就业、提干等各个方面均受歧视，备受压抑。遇罗克的《出身论》在全社会，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各高校引起巨大反响，尽管潜流在民间底层，但它的正义诉求绝不可忽视。

愤怒出诗人，质疑出哲人。在个人迷信甚嚣尘上，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文革条件下，思想者不是服从，而是坚持独立判断，提出另类的思想政治见解，批评亲密战友及其司令部成员言行不妥，要求与高层权力讨论是非，试图“扰乱军心”，“削弱斗志”，遭受打击迫害是题中应有之义，是“罪有应得”。那么，高晁次愚忠者的绝对效忠结局又是怎样呢？囿于文革中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及其核心、骨干们最终却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命运荒诞无比，容易引起多方面联想而具有高度敏感性，当局对此高度保密，我们只是从门缝中窥见到极其有限的一鳞半爪。所以仅能列举谭厚兰及其核心、骨干在衰落失势之后遭遇的少数几个案例。

四 平民子女因愚忠而苦难

笔者在前面曾述及1967年8月末林杰随王力、关锋倒台之后，谭厚兰派江河日下迅速衰败的简况。谭厚兰本人在1978年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病逝，终年45岁，一生未婚。笔者推断，谭厚兰之所以成为五大领袖中唯一的被“免于起诉”者，绝非因为其罪错逊于聂、蒯、韩、王，差别仅在于其身后的“保姆”更换成了完全不同甚至要清算前任的另外一批人，而她一如既往地“听话老实”，放弃自我辩护，按照需要的口径，无条件交代自己所知晓的上线内情，无条件自责悔罪，且因不堪的心理压力导致致命的绝症。她虽免受了此后的牢狱之苦，但却不惑而逝，相比其余四大领袖均能够超越古稀甚至白寿指日可待，谭的悲剧岂不更加令人悲叹：一个湘潭贫农最最平常不过的女儿，何以经历如此云谲波诡人生如此痛苦短暂，那个编辑部资料室令人羡慕的入口何以逆转为吃人深渊的洞口？

已知的井冈山核心骨干1970年后的情况如下：校文革常委、井冈山兵团作战部长、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周耀文被开除党籍，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井冈山兵团作战部副部长、数学系二年级学生王瑞龙，1965年社教入党，带领北师大与当地红卫兵疯狂地“讨孔”，在接受审查时试图跳楼自杀未遂，被宣布为“抗拒从严”，后被逮捕判刑8年；数学系二年级李竞权，因反大庆、迫害铁人王进喜、整余秋里和周总理黑材料，被隔离审查，赶到北医三院看病，从医院楼上跳下自杀死亡；中文系五年级王岚，在1966年7.27“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的大会上，侃侃而言，声名鹊起，成为谭厚兰的铁杆红卫兵，之后整理黑材料反总理，在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被判刑四年……

事实上，从1970年代“清查五一六”直至1980年代“清理三种人”，在近20年时间里，组织纪检部门对于全国尤其是北京的造反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审查清理。不同时期，其内容对象有所差别。对于老五届的工作、生活，影响重大且深远的，无疑是1981—1987年全党上下的“清理三种人”。对于谭厚兰派及造反兵团的审查、清理、处分当然不例外，其过程和结果要比本书记述的认真严肃得多，涉及面要大得多。之所以这样讲，一是源于双峰政治指导下的党中央极其重视；二是有关资料和当事人自述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所谓“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0年代主持组织纪检工作的陈云多次强调，在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向秘书交代，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革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他说：三种人“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在《通知》的最后一节着重指出，文革中大

学的红卫兵造反派作为清查的重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

198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对全市清理“三种人”进展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明了北师大所属的北京高等院校（其中有40所中央与北京市“双管”的院校，包括北师大）的进展情况：“从1983年1月至今年年初，全市各高等院校认真贯彻执行了中组发【1983】6号文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校一级造反组织核心成员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了‘记录在案’的工作，现已基本结束。共记录在案的851人，占1966至1967年间在校学生总数87695人的0.97%，目前已经转递出了材料……”此处报告给出的数字只是1984年的阶段性进展，真正结案则是1986年之后。该《意见》结尾说：根据中央精神，“我们正在对‘文革’期间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清理。”意味着1986年“在案”的人数肯定要高出1984年。根据清华大学老五届的研究，清华向外发函涉及问题学生大约三四百人之多，占学生人数的3-4%，大多要求定为“严重错误”以上罪名。北师大和清华一样，同样属于重灾区，按此比例计算，约6000人中被“记录在案”者当在150-200人以上。

知情人士指出，被“记录在案”的人员，依据错误严重的程度划分为三等“处理”：
①定为三种人，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非党群众要给予较重的行政处分；②犯有严重错误，要给予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控制使用；③犯有一般错误，基本不影响使用。但具体执行上因时因地而异。不论何种情况，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但只要是“记录在案”，那就是置于罪与非罪，错与无错之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顶，随时可能掉下来，给予致命一击。清查结论为“未发现什么问题”，但被“记录在案”的清华414派二把手孙怒涛深感不公地写道：“我几十年来感觉被打入另册……因为好几次，每当到了有关我的前途事业的关键时刻，事情总会莫名其妙地朝着不利方向逆转。就像我在行进中被一堵透明的厚墙挡在前面……即使今天我知道了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记录在案’在作祟，我也无处可问，无人可问，无理由可问。”

时至今日，北师大老五届学生中，到底有多少人、什么人被逮捕判刑，被“记录在案”；被“记录在案”者中，又有多少人，什么人分别被划为三种人、犯有严重错误、犯有一般错误，他（她）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官方从未公布相关信息，绝大多数当事人因为痛苦或者羞愧，或者不愿再揭旧伤疤而重提往事，不计其数的关注者、研究者无从知晓此一重大事项，只能深感遗憾。

五 摈弃旧怨，共同反思

回首近四十年前，作为因反对谭厚兰，质疑林彪“顶峰论”，同情兵团“倒谢”且归属“右派”子弟，在毕业鉴定过程中被谭派骨干“揪打戴装”、整肃、发配的无派系人士，我诚心拥护“清理三种人”运动，认为谭厚兰及其追随者紧跟“中央文革”，捣毁文物摧残文化，带头攻击老一辈革命家，迫害校内师生，镇压不同意见，并因此而有种种不当得利，理应受到惩罚，令其接受教训，吐出不当得利。后来从不同渠道得知一点“三种人”或“准三种人”受到刑罚或者处分的消息，也认为他们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阅读了包括《纯粹理性批判》《通向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新阶级》……在内的大量古今中外学术名著，了解和接触包括李慎之、方励之、许良英、刘辽在内的先知先觉者，思想发生了转变，得以逐步抛弃成王败寇的功利史观而转向人类自由解放的文明史观，抛弃独断的一元论而转向怀疑的多元论，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转向宽宏的普世价值。借助当代先进哲理反思七十年来所经历的包括文革在内的风风雨雨，得出了与此前大异其趣的认识。


关于谭厚兰及其核心骨干。他（她）们的的确确犯有大大小小的罪错，他（她）们理应受到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应当在法治轨道上进行。1980年代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则是一种政治惩罚，是由文革中失势，文革后重新掌权的政治领导人主导。其结果是，文革中大学、中学的一批高干子女红卫兵，在“联动”“西纠”“海纠”文革筹委会……的名

义下，在那个恐怖的红八月，干出了多少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伤天害理的罪恶，却在决策者“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指令下轻轻放过，成为近年来的高官巨贾，直至左右着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向；而平民子女造反派头头或积极分子，则要接受文件指导下的审判或审查，这其中有多少夸大、扭曲、张冠李戴、随意定性……除去当事人局部知情，我们这些局外人最多听说一鳞半爪。清华一学者2010年访谈蒯大富，蒯本人回忆，1980年代审判他时，他为自己遭受逮捕、拘押而鸣冤叫屈，一位法院领导人直面劝诫他：“不抓你，全国各地那一万个‘小蒯大富’，我们就无法处理（大意）。”由一滴水看见太阳，从这一件事、一句话，容易发现“清理三种人”与历次运动一样，是法律为政治所主宰的运动。这里公开、公平、正义，难免缺席。

正是因为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和指挥，被某种机遇推上文革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曾经颐指气使兴风作浪。仅仅两三年时间，被认为完成了推倒旧当权派的任务，又同时被认为偏离了朝令夕改神秘莫测的革命轨道，就从浪尖跌落谷底，作为过气的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接受批判、审查、清理，真真是“用之如玩偶，弃之如敝履”，后半生受到明里暗里的控制或歧视。我将他们与因持有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者，同样地视为文革的受害者、蒙难者，尽管公众对两类苦难的评价会有很多分歧。

进入2010年代以来，我有幸读到来自不同高校不同派别老五届反思文革的文字，他们当中有当年的造反组织著名领袖，活跃的积极分子，有高干子女、不同意见者、重度负罪者，当然更有普通亲历者……他们的文字角度不同，观点有所差异甚至发生争论，但是在回忆、反思、忏悔中，均表现出坦诚、正直、不计旧怨，共同指向一个崇高的目标：总结惨痛历史教训，批判传统体制弊端，反省国民人性弱点，将真相留给历史留给后代，以利创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我期待有几倍十几倍的北师大老五届，乘有生之年，加入这一方兴未艾的反思大军，为实现我们曾经的献身民族、献身未来、献身光明的理想发出最后的余热。

值此“五四运动”百年将至之际，我想以谨记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的告诫暂停本文的

讨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作者说明：本文多处资料和引文摘自张比、孙耘、唐少杰：“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

见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版，第1327-1355页。谨致谢意。

【序 跋】

借鉴前覆 展望未来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序

乔晞华

友人王复兴主编邀我写序。本书的主编、作者们均比我年长，作为文革研究的后学，我实在不敢当。但是盛情难却，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写一点我的想法权作为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群众运动始于北大，终于清华。北大在文革史上，尤其是文革群众运动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不了解北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了解文革的群众运动，也就无从了解文革。本书29位作者的33篇力作，为人们进一步展示了北京大学的文革历程，描述了北大文革的全景画面，提供了亲历者们的深刻反思，实乃功德无量。

本人认为：文革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内乱”（即“内乱说”）。这是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义。“内乱说”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权力斗争，把民众描述成为无知、非理性、无意识的群氓，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只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而已，根本没有必要在文革的官方史中写上一笔。更重要的是，“内乱说”把保守派和各级领导在文革中的罪责一笔勾消，邓及其追随者被打扮成文革的主要受害者，掩盖了

真正受害者是“黑五类”的事实。

文革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场政治运动。这是“一个文革说”学者对文革的定义。该派学者忽视了政党运动（Campaign）与群众运动（Movement）之间的本质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该派学者认为群众运动的目标既非改朝换代、也非推翻国家政权，只反官僚不反皇帝，连古代的造反者都不如。他们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视而不见的错误源于一个过时的理论框架——“乌合之众论”（the Crowd Theory）。他们认为，亿万群众卷入文革是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蛊惑和挑唆、是不明真相，造反群众是疯子、逍遥群众是傻子。非常遗憾的是，“乌合之众论”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就已经被西方学界摒弃了。但“一个文革说”对“毛泽东的文革”即统治者的文革确有深入的剖析，对文革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文革也不是西方学者定义的为期三年的“社会冲突”（即“社会冲突说”）。西方学者在分析文革群众运动时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把文革中的矛盾归咎于集团利益冲突。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占多数。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群众的派性。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冲突论”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被更新的社会运动学理论所取代，淡出了西方理论界。“内乱说”把文革作为十年一起否定出于政治考虑，造反群众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代名词，成为容量巨大的替罪羊。而罪魁祸首却仍被奉为神明，只是小错而大英明。“社会冲突说”可以撇清当局对造反群众的妖化。文革中的群众运动虽然有其独立性，应该与党的运动区别对待，但是群众运动并不像西方国家里的民主运动那样享受真正的自主权，并不完全独立。由于忽略了中国国情，西方学者一边倒地持文革三年期的观点。

文革也不是部分海外华人学者所说的“人民革命”（即“两个文革说”）。深受“社会冲突说”影响的海外华人学者大多亲自经历过文革，对中共及其体制有深刻的理解。该派学者认为文革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自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革命。在他们看来，人民文革不是乌合之众心理的非理性爆发，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和策略的群众运动。“两个文革说”的学者通过他们自身的经历和使命感从正面来描述文革的群众运动。此派学说大有可取之处。

但是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两派学者忽视了西方社会运动学，没有认识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群众运动属于改革运动。是改革而不是推翻现存整个体制的革命。文革涉及全国亿万民众和中共的各层官僚。

文革不是内乱，不是革命，也不能用政治运动一言蔽之。文革是一场不同的集团之间，为谋取各自利益的斗争，是诸多的决策主体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决策的一场经济和政治斗争。文革是党内以毛林和中央文革等为首的激进派，以周恩来等为首的温和派，以刘邓等为首的保守派，与党外群众运动中以上海工总司、广东旗派、湖南湘江风雷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以清华四一四派、四川重庆八一五、江苏P派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广西联指、湖北百万雄师、新疆三促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六个集团间和集团内进行的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即“博弈说”）。此即本人的六派博弈说。

文革的前三年中，党内、外的激进派和温和派联合起来对付党内、外的保守派，保守派无情地打压民众的激进派。当保守派垮台以后，民众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发生分裂打派仗。党内的激进派内斗，导致林彪集团倒台。此后，民众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同时受到残酷的镇压。文革的后七年，是党内的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激进派的彻底失败告终。文革是一场混战，六个集团没有固定的同盟，没有长久的利益，没有真心的合作，各打各的算盘，是一场非合作式的博弈。

文革的群众运动最终失败了。群众运动是被自己的内讧打败的。因“窝里斗”而最终被淘汰、被收拾、被镇压。认真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民主运动不无益处。被歪曲的文革群众运动史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与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在“内乱说”的影响下，造反群众与流氓成为同义词，受到民运人士的抵制和排斥。民运人士没有汲取前人的教训，后果是令人痛心的。尽管中国的民运人士鄙视文革造反群众，可是他们却依然继续在犯先驱们同样的错误：不包容、不妥协、无休止地争权夺利，直至自毁。在文革中，群众运动好歹还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领袖，领导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民众进行抗争。而今天的中国民运却是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比当年的造反群众还不如。这正应了美国哲学家 Santayana 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必将重蹈覆辙。”

文革结束已有四十余年，中国虽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自从1989年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民主运动。但是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相信：由无数抗议活动组成的社会运动将使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

采取经济改革开放但拒绝政治改革的一些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中先后倒台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突尼斯青年的自焚竟然能够导致巨大的中东社

会变革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在中东革命运动中，突尼斯成功地和平转型实现了民主，成为颜色革命的范例。这是因为各派革命民众妥协的结果。“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突尼斯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突尼斯第一大党。在过渡政府中各党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在权力配置、宗教地位、公民权利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分歧。由于经济下滑，伊斯兰政党为首的过渡政府危机重重。伊斯兰政党选择对世俗政党做出妥协。突尼斯举行了正式议会选举，该党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由“呼声党”取而代之。2015年2月，突尼斯新政府宣誓就职，标志着突尼斯过渡期平稳结束。2015年10月9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以表彰其在突尼斯政治过渡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突尼斯和平转型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民主运动重视。

而由于缺乏妥协精神，中东其他国家的民主状况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善，有的甚至变得更糟。“政治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得到何物。”（美国政治学家 Lasswell 语。）政治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决定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无论一个人的目的多么崇高或者多么渺小，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斗争都是政治行为。要做到在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只有通过妥协、合作、协商和争论来实现。由于资源有限，每个人对权力和资源的愿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会有输有赢。妥协和胜负难料是政治的两大特点。“善于妥协需要智慧，而敢于妥协却需要勇气”（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清华“老五届”学友孙怒涛语）。文革中的群众缺乏这一智慧和勇气，激烈地派斗，残酷地武斗，最后同归于尽，受制于人。我们现在有了妥协的智慧与勇气了吗？！

在 89 民运中，学生领袖之一、高自联常委王超华在广场上曾提议：学运应吸取文革学生运动的教训，可惜无人响应、没有引起探讨。王超华在洛杉矶五十周年文革研讨会上，再次提出 89 民运中上述的历史片断以及所提出的问题，那确实是个令人深思的课题。

未来民主运动的走向将会捉摸不定。中国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突尼斯的突发事件，导致巨大的变革；如果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能否接受文革群众运动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果出现了类似的变革，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世人将拭目以待。

以上是笔者以社会运动学理论研究文革的一家之言，现借本书的一块宝地，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对文革史的深入讨论和研究。

【书 讯】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出版

韦 陀

王复兴主编，于2019年5月由时代文献出版社（香港）出版，6月发行。该书共29位作者的33篇文章，以下是：目录；推荐语（丁抒）；编者前言（王复兴）；序言（乔晞华）。


丁抒 推荐语：

一度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就灾难的意义上来说，长达十年的文革是真正“史无前例”的。在眼下当局淡化对文革的记忆，将文革研究划为禁区、甚至有为为之翻案的苗头之际，当年北京大学的文革亲历者们推出这部《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是值得称赞、祝贺的。

任何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留下的文字都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当年的北京大学处于文革，特别是文革发轫之初的漩涡中心。该书的作者群从不同的侧面描述的经历及其对文革之前因后果作出的思考，是本书特别珍贵、有价值之处。

文章目录

- | | |
|------------------------|---------|
| 1. 文革历史概说 | 印红标 |
| 2. 毛泽东文革理论批判 | 王复兴 |
| 3. 文革后的哲学反思 | 李清崑 |
| 4.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 马子富 |
| 5. 文革10年对行政管理破坏及影响 | 孙兰芝 |
| 6. 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 | 扬子浪 |
| 7. 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 | 夏剑豸 高云鹏 |
| 8. 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 李清崑 |

- | | |
|---|---|
| 9. 访谈聂元梓 | 樊 平 |
| 10. 我所目睹的最早的文革暴力 | 扬子浪 |
| 11. 北大文革亲历者日记（节选：196 六五. 25——1966. 6. 20） | 陈景贵 |
| 12. 乔兼武的“造三个大反” | 扬子浪 |
| 13. 苍天啊，请告诉我，我的父亲在哪里？ | 李国治 |
| 14. 我的文革经历 | 任瑚琏 |
| 15. 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考 | 王复兴 |
| 16. 我和文革时期的北大保卫组 | 谢甲林 |
| 17. 往事有据可查 | 赵建文 |
| 18. 难忘的胜利团情谊 | 王明美 |
| 19. 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及其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 邵 瑜 |
| 20. 未名湖畔六载风雨情 | 李佳林 |
| 21. 进出炮局监狱纪实 | 刘 若 |
| 22. 我在北大的文革往事 | 章本照 |
| 23. 北大五年的零星记忆 | 林宗耀 |
| 24. 史无前例的北大岁月 | 齐秉贵 |
| 25. 昨夜西风凋碧树 | 王青苏 |
| 26. 五年求学一场梦 | 杨海峰 |
| 27. 文革微波影印 | 姜国廷 |
| 28. 名师缘结未名湖 | 朱培高 |
| 29. 檄文永在 风范长存 | 李平安 |
| 30. 陈惠民和他的《带蜜的山花》 | 万 宁 |
| 31. 文革诗词之潮与流 | 李树喜 |
| 32. 腥风血雨中的人性本善 | 廖光玲 |
| 33. 文革史应浓墨记载的一个名字：朱成昭 | 王复兴  |

【序 跋】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

编者前言

王复兴¹

2018年3月，《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出版并在亚马逊图书上架销售后，得到北大校友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响和关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此书，国会图书馆编目号是：2018938921（可在其检索系统查到）。上架并收藏此书的图书馆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大历史资料图书馆、北大校史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图书资料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英国BBC广播公司图书资料馆，等等。在众多校友的建议之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该书第二集。现在《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2集）》，继第1集出版一年之后，面世了！

第二集有29位作者的33篇力作。作者中，除了两位是北大教授的子女、一位是文革后的北大学者、教授之外，其他都是老北大人、北大文革亲历者，包括原北大文革两派的师生。再过二、三十年之后，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史学界和有兴趣的民众仍会持续不断地热烈探讨、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但那时已不再会有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与反思文字面世了，这类文字将成为绝响。本书的重要意义之一，即是给后人，给历史留下亲历者们对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离奇古怪的“大革命”之记忆与反思。

请读者关注：

本书有文革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中的二位、北大教授夏剑彘、高云鹏的文章《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讲述了引爆文革风暴的第一张大字报诞生过程；有北大哲学系教授李清崑的《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社会历史背景》，该文首次披露了近年解密

¹ 王复兴，北大历史系1970年毕业生，文革史独立研究者，简历详见第一集。

的北大社教、国际饭店会议的工作队《简报》等资料，李老师对文革前北大历次叠加的政治运动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有些文章，首次披露了一些新鲜的史料或以新的视角对文革进行了反思，如：美国博士扬子浪（谢定国）的《我所目睹的最早的文革暴力》；刘若女士的《进出炮局监狱纪实》；樊平：《访谈聂元梓》；王复兴：《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考》；谢甲林：《我和文革时期的北大保卫组》；等等。北大数力系教师章本照的《我在北大的文革往事》一文，记述了他于文革十年全程在北大的经历，折射出北大的十年文革历程。李平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在《橄文永在 风范长存》一文中，记述了北大同班同学李永长文革前公开批驳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事。邵瑜在《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及其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一文中，记述了她所目睹的历史系教授向达在文革中的遭迁以及康生霸占向教授珍贵遗产（藏书、文物）的情形。王明美的文章《难忘的胜利团情谊》，描述了他在3.29武斗中于40楼被俘后被打伤的情景与细节，值得研究北大武斗的人注意。四川大学语言文学教授任瑚璉先生在《我的文革经历》一文中，对当年北京著名文艺团体“新北大公社胜利团”的诞生与发展做了描述。此外，任瑚璉提到1966年底“新北大红旗兵团”与“学部红卫兵联队”合作，组织全市大会批斗彭罗陆杨，是首次面世的史料。本书选登了中文系毕业生陈景贵的文革初期日记节选《北大文革亲历者日记》（1966年5月25日至6月20日），提供了文革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刊登了几篇校友们在文革结束42年之后，从理论高度对文革进行的批判与思索。如，李清崑：《文革十年浩劫后的哲学反思》；王复兴：《毛泽东文革理论批判》；马子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革史专家印红标的文章《文革历史概说》，高度概括、总结了文革的发展过程，捋清了文革发展的脉络，对文革的性质、斗争焦点、历史分期、各阶段的特点，提出了本人的见解，进行了精辟的解说。作者说此文主要是面向青年读者，使他们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但实际上对已达古稀之年的亲历者老人们以及近现代史学者，也会有许多启迪和受益。

近年来，北大文革老五届的学友们有关回忆与反思文革的文章与书籍，多有出版，十

分可喜！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史在国内仍是禁区，但民间的研究却始终如地下的岩浆，热流奔腾，不断喷薄而出！在海外，则日益成为显学、热学。

在海外华人社会里有句流传极广的恼怒之言：“文革虽是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是在海外”。例如远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决定：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这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令人意外的是首届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于1988年春季在哈佛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此课程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程，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开课；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而中国文革史的课程却在这里开课，庄严而隆重。反观中国的大学，两相对照，母国官方对文革史研究之冷淡情景，实在令人不解、气愤、难过。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社会矛盾、党内矛盾得到淋漓尽致的暴露，中国人的国民性、人性之恶与善以及传统中华文化的美与丑，也得到充分展现。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在是个史学宝库、人文宝库、社会运动学宝库。从中挖掘有益于人类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以及人类的前进道路，极其有益，意义重大。这个活儿，当然首先应由中国人来干。当年处于文革漩涡中心的北大学子们，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言论、出版，人人有权，众生平等，无人可以垄断。对文革的回忆与反思，存在不同的记忆与认识，完全是正常现象，不可能也没必要“舆论一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百花齐放。这有利于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但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派性，它毕竟是一种丑恶、落后、愚昧的思想意识，它妨碍着对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因此不可以因为它的存在，而不去自觉地逐步地努力消除它。有人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派性也是一种合理存在，但凡存在的并不等于正确的并会永存不灭，端视其对社会的进步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上有声音批评北大“老五届”：老北大谈文革，派性比清华重。对这种批评，原北大两派

的校友都应该引以为戒，作为作者我们要努力自省，自觉地在回忆和反思北大文革的文章中去除派性，作为当年对立派校友文章的批评者，在辨正历史事实的同时，应尽量体谅和包容作者的情绪，尊重作者的不同见解。唯如此，我们才能弥合分歧，不重蹈当年派性斗争的覆辙。努力清除派性残余，同样应是北大“老五届”学友们“告别文革”的重大责任。

为历史、后人，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的记忆碎片与劫后思考，是我们最后的责任。期待今后有更多北大校友关于文革回忆与反思的文章、著述，如百花盛开，纷繁涌现。

本书在征稿、编辑、校对、出版的过程中，得到校友孙兰芝、丁广举、刘若、朱伟利、扬子浪（谢定国）等人的诸多帮助，深表感谢！本书的出版，是29位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是他们对历史作出的交待。📖

【述 往】

情系科大：岁月淌不尽的希望（下）

周 平

我的儿子是1976年10月出生的，那一个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多么重要。这一个月我边看边听边想。我才意识到这些年来我并没有甘心，没有认命。满月以后，1976年11月我给科大党委写信要求平反，但几个月过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信。我们往化工部某研究所调动也没有任何消息。我想和我档案的问题有关系，于是决定回科大去一趟。我这次回科大，不是想当反江青的英雄，也不想追究十年前的谁是谁非，更不想找谁算帐。我要寻回我少年时代的理想，圆我的科学家的梦。我想回科大继续上学。前几个月我们已经听到消息，1977年国家要恢复高考并要招收研究生。我和祥已经着手复习课程准备报考。这次回科大也是想打听一下招收研究生的事并借几本书回去。

我先找到我的同班同学何天敬。从马鞍山分手一晃，七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已经过而立之年。何天敬先带我找系里管政工的陈干事，一路上我们谈起这些年的经历。他说1973

年他在进修班补完了大学的课程，后来教了些课并且搞了些理论方面的研究。我说我真的很羡慕你。我又问他化物专业要招几个研究生，他给了我一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目录，还答应借给我几本书。

系里管政工的干事说：刘达书记在1973年被解放重新上任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大毕业生的档案调回学校，把文革中工宣队整的材料全部撤销。我说别人的撤销了我的没撤销，曾经有两个单位要调我，但档案一调过去就退回来了，我要求学校把我的档案调回重新作结论。陈干事说，你的情况比较麻烦，因为是北京市公安局抓的人办的案，得由他们正式来给平反。但现在没有中央文件，谁也不敢作主。我又去找了学校管政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但因为中央没有文件，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那天下午，我去找化学物理教研室主任辛厚文老师，想问问他招收研究生的事。辛厚文老师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家都认为你们当时就没有错，现在更没有错。“四人帮”刚垮台，许多事情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但这需要时间，不要急，耐心等待。我说，我们听说学校要调一部份业务骨干回校充实教学和科研队伍，我们都很想回校继续学习。辛老师坦率地说：你们64级同学只学了两年基础课，没有接触专业。我们这次主要想调61级以前的毕业生做业务骨干。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耽误掉一整代人，不然的话你们也该是研究员、副教授了。但现在你们还需要补课。你们如果愿意继续学习，可以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我不管什么“雄师”不“雄师”。辛厚文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雄师”明确表态，作为一个系领导，他能毫无顾忌地向我讲这些，我十分感动。我又在学校和安徽省委找了一些人，人们都很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对我表示同情，但没有一个人能帮我解决问题。

回到西平的小土屋里，我和祥谈到科大之行的所见所闻，我们关在这间小屋里太久了，外界的事象新鲜的空气涌进这宁静的小屋，我们意识到，一个历史的机遇已来临，这个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这个机遇，谁就抓住了明天，抓住了未来。平反不是要

的一张纸，要自己给自己平反。时光不会倒流，失去的青春不再回来。但我们要把握住今天。我们已不是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也不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我们已过而立之年，要每天工作八小时。那一年，女儿刚四岁，儿子刚一岁。要准备考试困难重重，但我们绝不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人考有一个希望，两个人考就有两个希望。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为了孩子的未来，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大运动量，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许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日子，自己都不相信人怎么会迸发出这么高的能量，经过这十年的风雨，我的脑子居然还那么好使。我有点相信特异功能，我想这大约是我们十年所积蓄下来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所产生的激光效应。我也相信上帝，他大概觉得这世道对我们太不公平，要帮我们一把。

从1977年6月到1978年4月，我们做了几千道题，记了几千英语单词。光草稿纸就有十好几斤重，在八个月时间里完成了三年的工作量。我们没有老师，只有靠书本和两个人的大脑，当答案和书本上的不一致时，我们就查资料翻书本，互相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赤，谁也不服谁。有时夜里祥把我叫醒告诉我某道题他想出解了，说着拧开电灯，两人又研究开了，他给我补充，我给他补充，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才继续睡觉。

这两口子是中了邪了，还是练功走火入魔了？放着舒舒坦坦的日子不过，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朋友们都劝我们：你们两个大学生在厂里好好干，将来一个技术科长，一个中心实验室主任，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人过三十不学艺，再说都两个孩子了，总不能把孩子扔下去上学？

他们说的全对，但我心里就一个不认命、不甘心。理想的种子在少年时代就在我的灵魂深处扎了根，尽管狂风暴雨，冰天雪地遏制了它的正常成长，但在这迟到的春天，它还要顽强地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多少有理想有报负有才华的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1977年，当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传来，人们才从十年的迷茫和混

乱中清醒过来，几千万老五届大学生，老三届中学生以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学生重新捡起书本，老师重新走进教室。那一年的高考真是不比寻常，人们看到父子同进考场，夫妻同上课堂动人场面，抱着孩子的父亲，刚生了孩子的母亲，都来参加高考，多少人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寻回自己青春的梦。对于那些出身贫苦又没有后门的青年，高考是他们唯一的机会。那一年有一千万人报考大学，近百万人报考研究生，参加这场竞争的学子，无论录取与否，他们都是强者，因为他们敢于向命运挑战。77级，78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正是从这一代人里选拔出来的，他们无疑是这一代人最优秀的代表。

那次考试考了两天半，考完以后，我们全身象散了架一样。这一个月来，我们心里充满了焦急，等待和盼望。考完以后，自我估计，我们都发挥正常，该拿的分都拿到了。但这第一次招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摸不着深浅。

六月份我们都拿到了复试通知书。我们的复试成绩也很好，按照初试和复试成绩的总和，如果按分数录取，我们都应该没有问题，那一年有好几个“雄师分子”都已在录取名单里，这时不知哪里传来一股风说“雄师分子”应暂缓录取，但研究生导师，系里和学校招生办，特别是王其武、马兴孝、伏羲路几位老师都坚定不移地表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感谢科大的老师们给了我们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我们能重回科大上学。

1978年8月祥和我都接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我们同时被录取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没有关系，没有后门，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我们高兴得抱着孩子在床上打滚，两个孩子从没见我们这么高兴过，他们看着我们笑，也跟着我们咯咯地笑。他们当时还不理解，这一步是我们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步对孩子们的一生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化肥厂沸腾了，西平县震惊了，那一年，“研究生”还是是一个刚出现的很神秘的新名词，乡亲们说考上高中是秀才，考上大学是举人，那么考上研究生就应该是状元了。乡亲们听说化肥厂的旧仓库里一下出了两个状元，而且还是“夫妻状元”都觉得挺新鲜，特地跑到旧仓库来，看看这“夫妻状元”是什么样的。乡亲们说我们是鲤鱼跳龙门，是凤凰登

枝，而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只是回到十几年前我们就该呆的地方。

1978年的深秋，我们离开西平县去中国科大上学，厂里的领导和许多朋友都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当火车驶离西平站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依恋。西平是我们人生途的第一站，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七年，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爱情，我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共同筑起了这个简陋，贫困而温暖的家。西平是一个避风港，西平县的亲人们保护着我们避开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给了我们友谊和关怀。我忘不了，当我生孩子时，秀梅、继芬冒着严寒用架子车把我们娘儿俩从医院拉回家，当我的奶水不够时，厂里的女工用她们的乳汁哺育了姗姗和海海，75年西平发洪水时，万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来给姗姗熬糊糊吃，逢年过节时，工人们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作客，吃芝麻叶蒜面条和豆腐脑……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在西平县出生的，今生今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们的历表上永远会写着他们是中国河南省西平县人。

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十几年的炼狱，十几年的血与火的煎熬，生与死的抉择，使我成熟了。我感谢上天给予了我这个机会让我继续追寻我的梦。

第三章 早逝的春天

科大，我的母亲，你带着十年累累的伤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8年的秋天，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77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来到了科大，使这所冷落了多年的校园显得欣欣向荣和生气勃勃。

这一年招收的新生中，年龄最小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他们不到十五岁就跨进科大的校门，他们是时代的宠儿。年龄最大的就要算78级研究生中的老五届学生(老五届是指从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66年到70年的大学毕业生)，那一年我们已过而立之年。我们几乎成了时代的弃儿，但仍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这些老五届学生象我们一样，大都有了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

告别了爱妻幼子，到这里来重新过学生生活，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端个碗到学生食堂里吃饭。和少年班以及 77 级的学生比较，我们成熟得多，生活磨掉了我们的狂热和浪漫，我们不再做居里夫人和诺贝尔奖的梦了，我们能比较冷静而现实地看待人生，都有着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感。

我和祥虽说是在同一个校园里，但住不同的楼，上不同的课，平时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星期六晚上一块去看一场电影都是一种享受。那时我们的工资是 105 元，每月给孩子各寄二十元，我们两人除了吃饭，几乎不花任何钱。因为我们还要攒钱去看孩子。女儿姗姗在四川姥姥家，儿子海海在江苏奶奶家。即使一年看一次，这一大圈的火车票也要好几百元，这些钱只有靠平时一点一点的攒。这次回来当学生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已不是无牵无挂的单身贵族了，我是姗姗和海海的妈妈，孩子是多么让我牵肠挂肚，我真是好想好想他们。尽管我知道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会给孩子们全部的爱，尽管两家老人经常来信详细介绍孩子的情况，但孩子们仍然需要父母的爱。分别时两个孩子眼泪汪汪的小模样一直牵着我的心。那时和我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女同学都是这个情况，大家一聊天就说起了自己的孩子。

说起来好笑，那时我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当学生去操场锻炼时，我就爱跑到幼儿园门口看着一个个孩子被爸爸妈妈接走，一路又蹦又说有笑，我真替他们高兴。虽然我知道我的姗姗和海海不在里面，但还是想要跑来看这一幕。我发现有我这习惯的不止我一个，那些做了爸爸妈妈的老学生象我一样，经常溜到这儿来看看，看不到自己的孩子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也是一种安慰吧。

那一年寒假，考完最后一门，大家连一分钟也不多呆，纷纷跑回家和妻儿团聚去了。我们两个人无家可回，又没有钱去看孩子，只好冷冷清清地在学校里过了个年。我们这个寒假谈的想的几乎全是两个孩子的事。

到了暑假我们把一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火车票并给孩子买了点见面礼。我们先到丹阳去接海海。到丹阳已是下午，最后一班下乡的车已经走了，天还下着雨，亲戚劝我

们在县里住一夜，但我们实在等不及了，踏着泥泞，连夜赶到了奶奶家。十个月不见，海海长高了长壮了。他看到了我们，一下子扑过来。我在儿子结实的脸蛋上使劲地亲，紧紧地抱住他不放，生怕他又跑了。奶奶叫我们在家多住几天，但我们已迫不及待地要见姗姗。

当我们三人回到成都姥姥家里，正是下午，姗姗在幼儿园里还没放学，我们等不及，就跑到幼儿园去接她。当姗姗看到我们三个人站在她的面前，惊喜地扑上来，祥把她抱起来，甩到天空，说：“长这么大了，我都快抱不动了。”我们一路走回家，两个孩子的小嘴不停地说，好象要把这一年积攒的话都倒出来。姗姗说，外公外婆没有告诉他我们要回来，但他心里想着我们这两天会来，因为学生已经放假了。她昨天做梦就梦见回家烧着可好吃呢。回到家里，我们拿出给孩子们礼物，姗姗穿上新的百折裙显得更漂亮了，海海穿上海军衣，显得更神气了。两个孩子穿着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去打螺陀转了。

整个暑假，我不愿离开孩子一分钟，象要把这一年我亏欠他们的都在这个暑假补起来。我为孩子们作饭洗衣，洗澡理发，我教他们写字画画。

我陪他们游戏玩耍。那一年，姗姗还不到六岁，外公外婆已教她念很多唐诗，也会写不少字。每天一早姗姗就在院子里念起来：“鹅，鹅，曲颈向天歌……”，“两个黄丽鸣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流传千古的绝句，从姗姗那清脆的童声涌出，更增添了诗意。外公外婆叫她一周背一首诗，一天描两页红模子。外公外婆经常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好好练字，他们一定要教孙子孙女练好字。他们认为，书法和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孩子启蒙教育的基本功。我们带他们去杜甫草堂，给他们讲杜甫的故事，带他们去武侯祠，教孩子们心算，加减法从一位数到两位数，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心算快的孩子将来一定逻辑清晰，思维敏捷。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间过的好快呀，暑假很快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学校了，临走的前几天，外公外婆已经在给姗姗做工作，说爸爸妈妈要回科大上学，如果学好了就能留在学校工作，就可以把姗姗和弟弟接到科大去上学。姗姗没有去过科大，但在她那小小的心灵里，那一定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大人一提起科大，都是很严肃很崇敬的。到走的时候，

她眼泪汪汪地粘着我，当我们上了车，她却双手仅仅抓住门把不放，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哭起来：“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海海也在车上哭起来，叫着：“我要姐姐来！”车上的人都惊呆了，谁也不忍把这个小孩的手掰开，这时外公过来，把姗姗抱起来说：“姗姗乖，爸爸妈妈上学是为了你们，爸爸妈妈学好了，姗姗明年才能去。”姗姗含着眼泪和我们挥别，车子开走了，我呆呆地望着越来越远的姗姗的影子，一直到看不见……

火车上，海海紧紧地拉着我说，今天夜里他不睡觉，他怕妈妈走了。但天一黑，他就睡着了。半夜火车到了蚌埠车站，我吻了吻熟睡的儿子，离开了车厢。祥直接送他去奶奶家。

回到学校我们拼命地学习，工作，想把成绩搞得好些，早日毕业把孩子接来。

这次回科大我上的是物理师资进修班。那一年没有人给我们开高等四大力学的课，物理教研室麦汝奇告诉我们，他从大连请来了一个李正道的同学给我们讲四大力学。我们听了半信半疑，以为他在开玩笑。第一次上分析力学课时，当我来到教室时，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前排，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制服，我当时脑子里冒出的想法是：“老麦不知从哪里给我们找了个老贫农来忆苦思甜。”旁边的同学悄声告诉我，这就是谭家岱老师，是李正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学，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了二十几年，刚从农村回来，就到科大来给我们上课。我心想听老贫农讲分析力学大概别有一番风味。

当他往讲台上一站开始讲课，我们都鸦雀无声了。他讲课时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思路，熟练的数学推导把我们都镇服了。他每学期给我们开一门新课。他最喜欢的是苏联物理大师郎道的体系，他系统地给我们讲了分析力学、数理方法、场论和量子力学。后来不少研究生和77届的本科生都慕名跑来听他的课。我们这个课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在当时的科大以及全国能开出象他这样水平的课的老师确实是不多的。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到他宿舍里去看他，他住在教员宿舍筒子楼里一间，房间里堆满了很多的书。我们聊了一会儿上课的事，就好奇地小心翼翼地问他一些过去的经历。他一

边抽着烟，一边慢慢地回忆，抗战时期他和李正道是浙大物理系的同窗，李正道是他们班年令最小的。后来李正道去了美国。1956年他刚三十出头，在大连工学院就被提为正教授。他当时年轻，业务又好，非常自负，五七年给上头提了几条意见，就被划成了右派，被送到农村劳改，老婆也跟他离了婚。我说，这二十多年的劳改，您也没忘记您的物理，我们都很钦佩您对物理学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诣。他说，那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基础打得扎实，后来劳改的时候，没有别的书看，自己脑子里就想个题目，算一算，解解闷。

有一年李正道到科大访问，谭老师陪同参观。他们两人虽然年令相仿，但看起来象差了十几岁，李正道是那么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看到他旁边的神情黯然的谭老师，我完全体会他当时的心境，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李正道留在国内而谭老师去了美国，那历史又会是怎样呢？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在会场上见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看到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还算幸运呢？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会上谭老师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并补发了多年的工资。

在会上，我也接到了两份平反文件，一份是为X平平反的文件，一份是为“雄师”平反的文件，后面有二十九人的名单。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把这张纸湿透了。我知道这每一个名子的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捕了五个“雄师骨干份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缓缓开出玉

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凭，天地做证，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这是1967年元月十四日发生在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的一幕，这是民心、民意，这是历史……

我拿着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很高兴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就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远远不止这二十九人，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十四日去拦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单，我说据我了解，受“雄师”一案牵连，在科大，在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有上千人，他接过名单说，对于科大的人我们会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对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

第三，受“雄师”一案牵连，我的八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记本归还给我。他说，事隔那末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

这八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日记，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来就是你的生命史。”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梦，这日记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

整页整页的抄在大字报上被人们批判，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世界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想到我的日记会成为我的罪状，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我的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梦……都永远地消失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文化革命中这惊心动魄的事件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那些关心我，同情我，爱护我，保护我的朋友和亲人，有些人和我并不相识，但为了“雄师”事件，他们有的人比我还要惨，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身体致残了，还有的下落不明……这些年我时时告诫自己，要不懈的努力，要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回报这些朋友和亲人。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动机，如果本文能公开发表，就算是我给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回报吧。我谨向那些具有同情心，为了良知，为支持我，爱护我，保护我而受到伤害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向那些屈死的冤魂献上我的哀思和怀念。

第四章 跨过太平洋

1981年我们毕业后留在科大工作。把两个孩子也接来了，一家人才团圆了两年。1983年祥考取了公费留学，于1984年以公费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 Delaware 大学化工系进修，第二年，他得到了一个博士后的位置。经济上有了保障，他就叫我去探亲。

虽然人人都想出国，但事到临头，我竟犹豫不决，那时候，我们都已提升为讲师，分到了两间一套的房子，再加加油，副教授和三间一套也不远了，我们已快到不惑之年，如果把现有的丢掉，到美国一切从零开始，前途未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最主要的是姗姗已经上初中二年级，初中高中这几年对于她是多麼重要，如果我带她出国一两年再回来，学习怕跟不上，如果留下她在国内，我不放心。但我有能力供她在美国上大学吗？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一本书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读到美国女作家尤恩森写的《宋氏三姐妹》，该书前言中有一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人们称宋耀如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

位女性的父亲，正是他的学习决心和他要为女儿提供他所获得的教益的愿望，使她们达到了各自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大胆进步的思想，那他的女儿们就可能缠足裹脚，在中国沿海一个小渔村里默默无闻地渡过一生。但宋是一个不受制于传统习俗的男子汉，他要主宰自己，不管上帝给他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他的理想——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美国受到教育。”（这段话摘自该书的中译本）

这个伟大的父亲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位最杰出的女性。正是这段震撼人心的话促使我下定决心，宋耀如的理念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人生目标和追求。

促使我下决心的另一件事是，1984年，在科大校园里，有三位中年教员相继英年早逝，一位是三十六岁的助教，清华毕业生，一位是四十三岁的讲师，科大毕业生，一位是四十七岁的副教授，留苏副博士，他们的死因很相似，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在追悼会上，看着悲痛欲绝的遗孀和失去父亲的年幼的孩子，大家心里充满了悲伤和对未来的忧虑。我们的生活实在太清贫了，早晨起来只吃一个馒头喝一碗稀饭，还有什么能量搞科研！和我一起工作的讲师王明老师说：“那一天我能早晨喝一碗牛奶，吃一个鸡蛋，中午吃一块大猪排，晚上吃一个苹果，我就能出科研成果。”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以为我在编什么神化故事，这是历史。祖国，你有这么多优秀的儿女，你可要爱惜他们呀！

1985年十月，我把姗姗送回成都外婆家。我离开姗姗时正是半夜，她已经睡觉了，我在她的额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泪水滴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眼角的泪水，知道她没有睡着。我说：“好好念书，妈一定要接你到美国去上学。”我牢记着临行前对女儿说的话，我愿付出一切去实践我的诺言。那一年，姗姗刚刚十二岁。

1985年年底，我带着海海飞往美国，我是多么地依恋这生我养我的母亲，这悠久古老而又饱受苦难的土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人生的足迹，在京密水渠、在京原铁路、在湖北沉湖农场、在西平县化肥厂，我撒下过青春的汗水。为中国的诺贝尔奖，为中国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发展作贡献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作为科大毕业生，我有能

力作出我的贡献，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为国效力的机会。我们的黄金年华已一去不返了。尽管我们的生活一直清贫，尽管我遭受了十几年不公正的待遇，我都能承受，我都能忍耐，我都能原谅，我对你的爱始终不变。如今，当我已届不惑之年，却要离乡背井，飘落异国，我不知在前面会是什么样的路，但我还是走出了。因为我不愿我们的后代象我们这样辛苦地活着。带着无奈，带着愁怅，带着无尽的思念，带着心灵的伤痕，祖国，请原谅我离开了你。当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瞬间，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悠悠乎乎地飘向那遥远陌生而又充满神奇诱惑力的新大陆。

尾声 雏燕展翅

为了给孩子准备学费。祥找到乔治城的一家中国餐馆送外卖，我在水门饭店(Watergate)附近找到一家美国餐馆当 waitrees, 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姗姗十四岁起就到快餐店打工，刚刚十一岁的海海也到楼下的人家里帮助做些家务。那时我和姗姗都在室内干，我们最担心的是祥，不论下雨下雪，他开着车走遍了乔治城的大街小巷，有时不小心吃了张停车的 ticket，那一天就白干了。我劝他不要干这个工了，他说干这活花时间少效率高，一周干三个晚上不耽误白天上学，全家人齐心协力，积少成多，三年五年的孩子的学费就有了。

孩子们过生日那天，祥把上星期打工挣的 180 块钱装在两个红包里，送给他们作为生日礼物，两个孩子扑在爸爸身上，海海拿着自己刚刚挣到的二十元钱说要把钱存起来给姐姐攒学费，姗姗说：“爸爸，你不要打工了，我好好念书争取拿奖学金。”祥把孩子紧紧搂住说：“别说傻话了，我们不作那个梦，我们没有绿卡，爸妈知道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只有三年的时间，能在三年内在人文学科方面赶上美国学生的中等水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你们上进，爸妈一定全力支持。”


人是靠着希望而活着，是为着爱而活着，虽然我们没有绿卡，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也没有钱，但我们有一对聪明，可爱又努力上进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和生命，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有我们的欢乐和爱，我们坚信，凭着我们的智慧和勤奋，我们一定

能在新大陆开出一条路。

冬去春来，姗姗已经上十二年级了，我们的积蓄也一点点慢慢上涨，算起来也够她上三年私立大学的学费了。我们鼓励她报考最喜欢的学校：“只要你考得取，我们一定支持你上。”我们想得很清楚，钱以后还会有机会去挣，但孩子上学的机会失去了就很难弥补。二十几年前，我们的机会已经永远地失去，今天，不能因为钱而让孩子失去她的梦。

1991年三月的一天，姗姗打电话到学校来，辟头一句话就是：“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打工了，我拿到奖学金了，我可以自己供自己上大学了。”到美国仅仅三年，还没有绿卡的姗姗以全额奖学金被著名的C大学录取了。我们把录取通知书反复看了几遍，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时，我们全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哭了。

1991年九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全家人到Dullas机场送姗姗到加州上学。昨天，我们没有嘱咐她很多，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也不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坐飞机。我们只送给她一本日记本，在扉页上写着“崇尚真理，独立思想”。姗姗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今天，终于盼到了，她满怀信心地登上了飞机。望着她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矫健的身影，此时我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这象个神话又象一场梦，那个在西平农村小土屋出生的小女孩今天终于跨进了科学的殿堂，十七年的岁月，从地球的那一边到地球的这一边，这是一条多么遥远，漫长而坎坷的路。你走过来了。命运对你并没有特别青垂，你生于忧患，你长于贫困，我们没能给你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没有金钱财富，但你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就是那人类文明和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源泉。我们没有官爵地位，但你懂得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靠奋斗去争取自己的未来。你饮过黄河长江的水，你冲击过波多马克河的浪涛，渊远流长的东方文明哺育了你，绚丽辉煌的西方文化沐浴着你。如今，你要展翅飞翔了。飞吧，我的勇敢的小燕子，载着你的理想，载着几代人的希望，飞向那辽阔的天空，去追寻你的梦想。

“雄师”一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年。之所以现在发表是我感到时间的紧迫，近几年我的同班同学已经有几个过世，再不写下来就太迟了。一些年轻人看了以后觉得不可思议，有人怀疑我是编的故事，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我这把年纪没有必要在网上编故事赚点击量。

我可以提供如下证据：

1. “雄师”一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都有记录，您可以去查。
2. 本人保留有中国科技大学党委 1979 年给我的两份平反文件的原件，如果需要我可以在网上贴出。
3. 最近我得到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原文，该文在全国不少地方都被转抄过，如果需要我可以在网上贴出。

4. 1966 年到 1967 年在北京玉泉路科大的学生老师和员工许多人都还活着，他们都是历史见证人。

我们这一代能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留下这段历史，使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这种人为的悲剧，这大概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一个历史使命和留给后代的遗产。

作者简介：周平 6431

1964-1970 中国科技大学学生

1970-1972 湖北沉湖军垦农场 劳动

1972-1978 河南西平县化肥厂 劳动

1978-1981 中国科技大学物理进修班学习

1981-1985 中国科技大学 教师

1985 年赴美留学，获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hD

退休前 为美国联邦政府雇员

【读者来信】

何蜀：关于第 255 期的误植和补充：

(1) 青海省“无产阶级大革命大事记”，少了“文化”二字。

(2) 《冼恒汉回忆录》应为《冼恒汉回忆录》。

(3) 启之的《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一文有两处需要补充，（一）甘肃文革资料中，应提《江隆基最后的十四年》（王戈、王作人著，作家出版社 2015 年）。此书后边有一部分写到文革时省委支持李贵子批斗江隆基，江隆基的被批判和自杀，引起广大师生的反感。以及兰州大学为此分裂成的两派等情况，对研究甘肃文革有帮助。（二）陕西文革不可不提户县农民画。它不但是陕西文革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文革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段景礼写过一本《户县农民画研究》（西安出版社，2002）似应列入其中。📖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二、定制服务：

(一) 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二) 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三) 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家族徽标 + 家族文化墙 + 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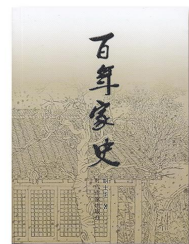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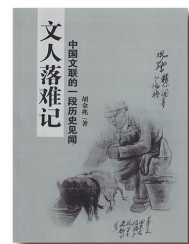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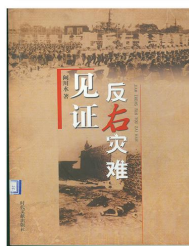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家谱传记文化馆 + 定制服务 + 兴趣班 + 寻根游 + 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